

## 論「國粹」與「香豔」

——民國初年南社與抒情傳統的發現與重構

陳建華\*

### 摘要

在中國抒情傳統中《玉臺新詠》的「豔詩」與韓偓的「香奩」體因描繪男女私情與感官刺激向來遭到儒家正統文學觀的排斥。晚明詩人王次回被認為集「香奩豔體」之大成，清末民初出現「香豔」一詞成為新的文學概念。蟲天子等編輯的《香豔叢書》收入歷代被壓抑的文學著作335種，涵蓋詩歌、散文與小說等各種文類，意味著對抒情傳統的重新發現與重構。本文對民初南社文人所主編的一系列以「香豔」命名的雜誌與書籍作考察，探討它們與歷史進化、國粹與男女平權等觀念的關係，揭示其反專制的文化政治與純文學的美學特征，對於認識中國文學現代性具有歷史價值。

關鍵詞：國粹、香豔、南社、抒情傳統、民初

---

\* 作者現為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榮譽教授。



## **The “National Essence” and “Fragrant-Erotic Literature”:**

The Southern Society and Its Dis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Lyric Tradition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Jianhua Chen<sup>\*</sup>

###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lyricism, the “erotic lyrics” represented by *New Songs of Jade Terrace*, an anthology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e style of “fragrant boudoir” created by Han Wo in late Tang were condemned by orthodox Confucians for their representations of amoral love and sensational feelings. The late Ming poet Wang Cihui mixed the two styles, from which appeared the term “fragrant-erotic”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mplying historical dis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yricism. This paper gives a survey of *A Collection of*

---

<sup>\*</sup>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Fudan University; Professor, Chinese Classics Research Institute, Fudan University, China; Professor Emeritu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fragrant-erotic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1909, which included 355 works of poetry, prose, and fiction; all of them were officially repressed in the past. It also focuses on a series of fragrant-erotic magazines edited by literati of Southern Society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exploring behind them the new ideas of historical progress, the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equal righ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By revealing their cultural politics of anti-autocracy and aesthetics of sophisticated ex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it helps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ies.

Keywords: national essence, fragrant-erotic literature, Southern Society, tradition of lyricism, Early Republican era

## 論「國粹」與「香豔」

——民國初年南社與抒情傳統的發現與重構

陳 建 華

### 一、前言：《國粹學報》與南社文學

民國初年報紙副刊與雜誌風起雲湧，僅1914年出現《禮拜六》、《中華小說界》、《眉語》等三十餘種文藝雜誌，前所未有地融匯文學、美術、戲劇乃至電影於一爐，由晚清報刊發軔的「新媒體」更趨繁榮，<sup>1</sup>在「共和」理念驅動下，知識人與印刷資本、大眾消費合力從事都市日常生活現代性的建設。此時小說已占據文學生產的龍頭地位，1915年梁啟超（1873-1929）在〈告小說家〉一文中指出：「偵探」與「豔情」這兩種小說盛行於時，並厲聲直斥它們「誨盜」、「誨淫」，遂警告小說家「若猶是好作為妖言以迎合社會，直接坑陷全國青年子弟使墮無間地獄，而間接戕賊吾國性使萬劫不復」。<sup>2</sup>十餘年前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宣導「小說界革命」，文中已幾將

---

<sup>1</sup> 參陳建華：〈民國初年新媒體與社會文化力量的崛起〉，《文匯學人》第9-15版，2017年2月24日。黃旦：〈「新報之事，今日之事」：上海進入新媒體時間——初期《申報》與上海研究之一〉，收於黃旦主編：《城市傳播：基於中國城市的歷史與現實》（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23-236。

<sup>2</sup> 梁啟超：〈告小說家〉，《中華小說界》第2卷第1期，1915年1月，頁1-3。

《水滸》與《紅樓夢》視爲「誨盜」、「誨淫」，指斥其爲中國「舊小說」的代表，是「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原」。<sup>3</sup>嗣後「小說界革命」發展迅猛，以政治小說、理想小說、譴責小說等爲主流，演奏了晚清時期救亡啟蒙的主旋律。至民初他重彈舊調，從「偵探」與「豔情」小說的盛行這一點來看當時文壇，文學不再高呼「革命」而訴諸娛樂消費與抒情滿足，顯出以改良手段進行文明規訓的社會功能，可見由「共和」帶來的意識形態與文學風尚的轉型。

1912年徐枕亞(1889-1937)的《玉梨魂》在《民權報》上連載，次年出版單行本而風靡一時，被視爲民初「豔情」小說的典範；1914年徐枕亞創辦《小說叢報》，與吳雙熱(1884-1934)繼續發展「豔情」風格，被稱爲「鴛鴦蝴蝶派」大本營。民初與「豔情」小說同樣風行一時的另有「香豔」文學，與「豔情」風格相近，就筆者所見，以「香豔」命名的著作和雜誌有蟲天子(張廷華)等編《香豔叢書》(1909-10)、汪石庵主編《香豔集》(1913)、王均卿(1867-1935)主編《香豔雜誌》(1914-16)、胡寄塵(1886-1938)主編《香豔小品》(1914)周瘦鵑(1895-1968)編撰《香豔叢話》(1914)等。其他以「香豔」標榜的創作與批評在在皆有，不勝枚舉。清末民初社會思潮此起彼伏各競雄長，文學思潮中「復古」與「國粹」均爲關鍵詞。「香豔」文學也是如此。從作者來看，徐枕亞、王均卿、胡寄塵和周瘦鵑等皆爲南社社員，文學主張與實踐皆有其「國粹」的思想淵源。

代表晚清國粹派的是1905年黃節(1873-1935)、鄧實(1877-1951)創辦的《國粹學報》與「國學保存會」，其會員大多是南社成員。<sup>4</sup>據

<sup>3</sup>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第1期，1902年11月，頁1-4。

<sup>4</sup> 關於清末民初的「國粹」思潮與《國粹學報》，學者多有論述，如鄭師渠認爲晚清國粹派不僅不是「封建」、「保守」，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在傳統的學術文化領域的延伸」。見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另參林香伶：〈歷史記憶的現代性意涵——論《國粹學報》的史傳書寫〉，《反思、追索與新脈：南社研究外編》(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頁171-226；

鄭師渠對早期國學保存會的考察，23位成員中有16位是南社成員。<sup>5</sup>孫之梅指出：「近代數十年的國粹思潮中，南社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力量，表現出持續不斷的國粹情結。」<sup>6</sup>林少陽從章太炎的「南方」言說的角度分析了《國粹學報》與南社之間在精神上的緊密聯繫。<sup>7</sup>「南社」的命名具地緣政治色彩，有其反清反專制的意涵，而上海的在地政治條件及文化資源也起了重要作用。章太炎（1869-1936）在《國粹學報》上發表了大量有關語言文字、史學、文學等方面的文章，說他是南社的精神導師並不為過，雖然他未掛名於南社。

黃節在〈國粹學報敘〉中聲稱：「立乎地園而名一國，則必有其立國之精神焉，雖震撼攙雜，而不可以滅之也。滅之則必滅其種族而後可；滅其種族，則必滅其國學而後可。……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sup>8</sup>以「國粹」為號召，事實上在留日學生及革命派的「種族革命」與「社會革命」的理論基礎上從事史學、學術史與文化傳統的重構，以回應時代挑戰。這些方面南社成員黃節、陸紹明、馬敘倫（1885-1970）、陳去病（1874-1933）等人發表了許多言論，但南社主要是文學團體，因此《國粹學報》與南社文學或文學南社的關係頗為複雜，尚有探討的空間。

南社的文學主張與實踐千姿百態，但共同遵循了「國粹」的思想與文化的基本方針，簡言之有這麼幾點：首先在晚清反清革命的歷史條件下，對漢語漢字的強調凸顯其語言本體與文化主體的地位。<sup>9</sup>1908年章太炎在〈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中駁斥吳稚暉

---

Tze-ki Hon, *Revolution as Restoration: Guocui Xuebao and China's Path to Modernity, 1905-1911* (Leiden: Brill, 2013).

<sup>5</sup> 參孫之梅：《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頁231-234。書中引述了鄭師渠的考察結果並有所辨證。另參林少陽：〈章炳麟と清末における「南」言說〉，《華南研究》第1號（2014年2月），頁58-59。

<sup>6</sup> 孫之梅：《南社研究》，頁255。

<sup>7</sup> 林少陽：〈章炳麟と清末における「南」言說〉，頁49-70。

<sup>8</sup> 黃節：〈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第1卷第1期，1905年2月，頁2a。

<sup>9</sup> 參沈心慧：《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

(1865-1953)等人的歷史虛無主義，指出取消漢字不啻滅絕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而他與國粹派所面臨的要務正在於藉漢文典籍喚醒民族的歷史記憶，重新發見民族歷史的精髓而重建文化主體。<sup>10</sup> 其次無論是劉師培(1884-1919)的「文筆說」還是章太炎的「師法魏晉」，都確認中國的言志與抒情文學傳統，如南社的詩歌成就所示，正是通過浪漫激情的集體感染完成了對於民族「想像共同體」的文學建構。<sup>11</sup> 因此文學屬於情感的、美的領域，是南社同人的共識。第三以「國粹」為主體迎受外來文化，使傳統得以啟動更新而與世界人文價值接軌。許守微的〈論國粹無阻於歐化〉一文的標題就把這一點表達得十分明顯。<sup>12</sup>

其實鄧實在〈國學真論〉中將「國學」與「君學」相對立，<sup>13</sup> 反對專制是南社對待歷史遺產的基本立場，滲透著近代民主共和的價值觀。1905年黃節〈國粹學報敘〉：「凡欲舉東西諸國之學，以為客觀，而吾為主觀，以研究之，期光復乎吾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已。」<sup>14</sup> 稍後高旭(1877-1925)在〈學術沿革之概論〉中也有「對於內有之學，其惟用主觀主義乎？對於外來之學，其惟用客觀主義乎？」的論調，而把反專制這一層發揮得更透徹：「中國學術思想不進步，其原因何在乎？在政體之專制。泰西學術思想日以進步，其原因何在乎？在政體之文明。文明國憲法上定有條例，許人民以三大自由，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sup>15</sup>

---

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政大中文學報》第19期(2013年6月)，頁121-154。

<sup>10</sup>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見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337-353。

<sup>11</sup> 參張春田：《革命與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與中國現代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288-356。

<sup>12</sup> 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國粹學報》第1卷第7期，1905年7月，頁1a-4b。

<sup>13</sup> 鄧實：〈國學真論〉，《國粹學報》第3卷第2期，1907年2月，頁1a-4b。

<sup>14</sup> 黃節：〈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第1卷第1期，1905年2月，頁3b。

<sup>15</sup> 見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在國粹與西化的兩端之間存在遊移與選擇的空間，對於主客體的側重程度因人而異，高旭又說「吸收與保存兩主義並行」時，對於主客體關係作了另一種表述。但是不管怎樣，強調國粹的文化本位是南社的基本立場，遂造成其文化保守的性格特徵，這與「五四」的反傳統立場形成鮮明對照。尤其民國成立之後許多南社成員轉向都市大眾文化生產，這一文化保守性格在維護城市經濟秩序與中產階級的倫理價值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sup>16</sup>

《國粹學報》與南社的文學之間有很多裂隙與空白。政治上《國粹學報》具反清革命傾向，不少同盟會會員加入了南社，但是迄今一個弔詭現象尚未得到關注，即為《國粹學報》撰稿的也包括鄭孝胥（1860-1938）、王闓運（1833-1916）、嚴復（1854-1921）、王國維（1877-1927）、陳三立（1853-1937）、鄭文焯（1856-1918）、范當世（1854-1905）、樊增祥（1846-1931）、易順鼎（1858-1920）、羅瘿公（1872-1924）、況周頤（1859-1926）等。他們既非南社社員，政治上不革命或反革命，甚至大多在民初成了遺民。這些人皆為當世名士，並不參與國粹派的學術討論，所發表的多為文學作品。他們主張「復古」而與國粹派走在一起，而《國粹學報》也借重他們的名氣，為雜誌造勢。有意味的是《國粹學報》於1911年9月停刊，接下來發生辛亥革命，此後「國粹」與「復古」就分道揚鑣，拉開了距離。

1912年高燮（1879-1958）、高旭等成立「國學商兌會」，幾乎清一色南社人。高旭聲言：「今幸民族朝政，頓異曩昔，則吾社之宗風大暢而未盡者，非政治之發揚，乃在道德與文美耳。」主張以「促進道德，增進文美」作為「培養其本根」。<sup>17</sup>如果說《國粹學報》所進行的國學整理受到「種族革命」的驅動，那麼民國建立之後國學的任務應

---

年），頁45。

<sup>16</sup> 參陳建華：〈「共和」的遺產——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二十一世紀》第151期（2015年10月），頁51-67。

<sup>17</sup> 陳建華：〈「共和」的遺產——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頁300。

當轉向共和政治及其文化建設。的確「國學商兌會」從當初「國學保存會」一路而來，在新形勢下繼續「國粹」路線，更顯出南社色彩。

上述這些復古人士大多是晚清文壇的代表，在文學上對南社產生影響。1911年賈璧雲（1890-1941）在北京演出，以其旦角的出色表演得到易順鼎、樊增祥、羅瘿公等人的賞識，他們在《亞細亞報》、《庸言》等報刊上大力揄揚。同時上海柳亞子（1887-1958）、胡寄塵等人在《民聲日報》、《太平洋報》上極力推崇馮春航（1888-1941），於是南北兩地形成「賈黨」和「馮黨」。雙方在報刊雜誌上大打筆戰，以致有人認為是南方革命派與北方官僚派之間的鬥爭。<sup>18</sup>另一個例子是南社內部以柳亞子的「宗唐派」與姚鵞雛（1892-1954）的「宗宋派」之爭，為姚所稱讚的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等「同光體」詩人都曾是《國粹學報》的作者。

南社研究一向以詩歌為主，即以詩歌選集的《南社叢刊》為主要依據，最近學者提出南社與小說的關係，<sup>19</sup>引起南社的性質及柳亞子的領導角色等問題，尚有待深入討論。如包天笑（1876-1973）是早期南社社員，1910年第三次雅集時被推舉擔任「庶務」一職。<sup>20</sup>1904年狄葆賢（1873-1941）創辦《時報》後不久，包即為主筆之一。據季家珍的研究，包天笑等人為開闢「中間社會」的輿論空間作出了貢獻，<sup>21</sup>他也最早從事大眾文化生產，1909年創辦《小說時報》，1911年創辦《婦女時報》，因此被譽為「通俗文學之王」。<sup>22</sup>1907年《小說林》雜誌創刊，包即為撰稿人之一，該刊主編黃人（1866-1913）也

<sup>18</sup> 參劉訥嶼：〈梨園內外的戰爭——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上海京劇界的馮、賈「黨爭」〉，《文藝研究》2013年第7期，頁101-110。

<sup>19</sup> 參姜國：《南社小說研究·初探》（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年）。

<sup>20</sup> 見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編》，頁166。

<sup>21</sup>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22</sup> 欒梅健：《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頁184。

屬早期南社社員，在文學理論與文學史教育等方面皆有建樹，<sup>23</sup> 他認為「文學則屬美之一部分」。<sup>24</sup> 同樣在〈小說林發刊詞〉中提出「小說者，文學中之傾於美的方面之一種也」，<sup>25</sup> 首先強調小說的感情與審美功能，與梁啟超一派把小說當作救亡啟蒙之具的理論大相徑庭。

《國粹學報》很少有關小說方面的論述，幾乎聽不到包天笑、黃人等人的聲音。值得注意的是在 1910 年該報後期王國維連續發表了〈優語錄〉、〈宋大曲考〉、〈錄曲餘談〉等有關戲曲史的文章。王主張「復古」，而對戲曲、小說的研究已具有現代觀念。早在 1904 年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提出：「美術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其頂點」，與梁啟超唱反調，認為《紅樓夢》：「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由其最能體現「美術之目的」，給痛苦的人生帶來「解脫」與「慰藉」，所謂「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而忘我與物之關係」。<sup>26</sup> 又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中說：「甚至戲曲、小說之純文學，亦往往以懲勸為旨，其有純粹美術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貴，且加貶焉。」<sup>27</sup> 王國維的「美術」論述對劉師培、魯迅（周樹人，1881-1936）等人都有互文關係，而在黃人那裡也得到某種呼應。

南社是全國性文學社團，民國建立後發展迅速，成員達千餘人。因此對於他們的文學面貌須避免標籤化，而應當在整個清末民初錯綜複雜的文學場域中作具體考察。這也適用於本文的民初「香豔」的探

<sup>23</sup> Milena Dolezelová-Velingerová and M. Henry Day, "Huang Moxi 黃摩西 (1866-1913): His Discovery of British Aesthetics and His Concept of Chinese Fiction as Aesthetic System," in *A Passion in China: Essays in Honour of Paolo Santagelo for His 60<sup>th</sup> Birthday*, ed. Ling-yeong Chiu and Donatella Guida (Leiden: Brill, 2006), 93.

<sup>24</sup> 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南京：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65-168。

<sup>25</sup> 摩西：〈小說林發刊詞〉，《小說林》第 1 期，1907 年 6 月，頁 3。

<sup>26</sup>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教育世界》第 76、77、78、80、81 號，1904 年 6-8 月。

<sup>27</sup> 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教育世界》第 99 號，1905 年 5 月，頁 3。

討，大多南社成員既主張「國粹」，也融匯「西化」，具有中西合璧、新舊兼備的思想傾向。

## 二、「香豔」與「情」的進化

「香豔」與「豔情」相近，類型不同，皆源自古典詩歌譜系。「香豔」一詞見諸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憑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豔。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豔，尤能醒酒。』」<sup>28</sup>「香豔」形容花，與豔情場景扣連。宋代女詩人朱淑貞（約 1135- 約 1180）〈惜花〉詩中：「便做即今風雨限，要看香豔繡蒼苔。」<sup>29</sup>這裡以「香豔」之花來比作自我的幽妍資質。在文學上「香豔」與「香奩」是近親，至近世由通俗管道廣為傳播，清初小說《平山冷燕》第一回敘述天子看到十歲女子的「驚人奇句」時：「忽欣然拍案曰：『細細觀之，風流香豔，果是香奩佳句。』」<sup>30</sup>又如清末李伯元（1867-1906）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三十九回：「這種香豔詞句必要使它流入閨閣才好。」<sup>31</sup>如小說人物在討論以「美人嘔」、「閨思」等為題的詞作，反映了當時「香豔」文學流行的情狀。

這些屬於「香豔」的一般使用，其特定意涵與詩歌的類型發展有關。文學史上自屈原以來「香草美人」向來屬「抒情傳統」中重要部分，在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的教條約制下，情愛表現帶上政治或道德的面具。然而私人感情很難永遠被集體化，如《玉臺新詠》聲稱

<sup>28</sup>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 3833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年），頁 16。

<sup>29</sup> 朱淑貞著，冀勤輯校：《朱淑貞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頁 48。

<sup>30</sup> 李致中校點：《平山冷燕》（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2 年），頁 8。

<sup>31</sup> 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收於章培恆、王繼權等主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15。

所收作品皆為「豔歌」，<sup>32</sup>《四庫全書提要》說蕭綱（503-551）「為太子時，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批評該集「雖皆取綺羅脂粉之詞，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淫豔斥之」。<sup>33</sup>一面指斥「綺羅脂粉」或「淫豔」的「豔詩」；一面以儒家詩教作某些肯定。「豔詩」表現男女私情且有「綺羅脂粉」或「淫豔」傾向，開始從「香草美人」政治隱喻的模式分離出來，而使感情表現獲得某種自主性。唐代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李商隱（約813-約858）、杜牧（803-852）等涉及「豔詩」的創作，有趣的是《四庫總目提要》收錄他們的文集，在批評中轉彎抹角旁敲側擊，似心有戚戚不忍趕盡殺絕。

《四庫全書》收入韓偓（約842-約923）的《韓內翰別集》，稱讚他的詩：「性情既摯，風骨自適，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sup>34</sup>並提到他的《香奩集》，卻不料其涉及閨房私情表現的「香奩體」明清以來不絕如縷，明末在王次回（1593-1642）那裡突發異彩，他的《疑雨集》對男女之情的感官與心理的細膩刻畫，被稱作「沉博豔麗，無語不香，無愁不媚」。<sup>35</sup>清代朱彝尊（1629-1709）說：「誦之感心嫋目，迴腸盪氣。」<sup>36</sup>王詩在清代引起爭論，占上風的仍是衛道一派，沈德潛（1673-1769）在編選《國朝詩別裁集》時，大加撻伐，「如王次回《疑雨集》之類，作足害人心術，一概不存！」<sup>37</sup>其之所以遭到排斥，因為

<sup>32</sup> 章培恒先生認為《玉臺新詠》是由陳後主的寵妃張麗華編纂而成。參章培恒：〈《玉臺新詠》為張麗華所「撰錄」考〉，《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頁5-17。

<sup>33</sup> 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686-1687。

<sup>34</sup> 韓偓：《韓內翰別集》，見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302。

<sup>35</sup> 侯文燦：〈疑雨集序二〉，收於王次回：《疑雨集》（上海：掃葉山房書局，1926年），頁1。

<sup>36</sup>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9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19，頁8a。

<sup>37</sup> 另如黃仲則在清代頗有名聲，對他的那些「放浪酣嬉」、「鴆酒好色」的「豔詩」，有人心知其好，卻諱莫如深，有的則加以排斥。參葉倬璋：〈抒情傳統與現代——黃仲則詩在民國〉，《淡江中文學報》第29期（2013年12月），頁408-414。

它不像「豔詩」與「溫柔敦厚」的詩教尚有通融的餘地，而以更能動人心魄的情色想像而對正統詩學形成挑戰之故。到了清末民初在「純文學」與人性新觀念的驅動下，《疑雨集》風靡一時，與山寨版《疑雲集》一再翻刻至十數版，流風餘韻披及現代作家郁達夫（1896-1945）、張恨水（1895-1967）等，<sup>38</sup>甚至在日本被永井荷風（1879-1959）稱為「中國的波特萊爾」。<sup>39</sup>

清初詩家王士禛（1634-1711）說：「次回豔情詩數百篇，刻畫聲影，有義山、致光所未到者。」<sup>40</sup>即指出王的詩作超軼「豔詩」與「香奩」的成就。嚴繩孫（1623-1702）為《疑雨集》作序曰：「詩發乎情，而王風之變，〈桑中〉、〈洧外〉列在三百，為豔歌之始。其後讀曲，〈子夜〉寂寥促節，在唐則玉溪恂恂，旨近《楚騷》，韓相香奩，言猶微婉。於是金壇王先生彥泓，以閎肆之才，寫宕往之致，窮情盡態，刻露深永，可謂橫絕古今也。」<sup>41</sup>可說是在一種不無重構的抒情譜系中發揮了王士禛的說法。相似的表述如陳維崧（1625-1682）的《婦人集》說王次回「以香奩豔體盛傳吳下」，<sup>42</sup>另如吳雷發《香天談藪》說：「香奩豔體，至王次回《疑雨集》而極，實度越溫李。」所謂「香奩豔體」成為王次回的獨家標籤。由此演變為「香豔」一詞，在民初大行其道，演變為一種時髦的文學風尚的指稱，包括詩詞、散文與小說等，當然王次回成為作家們的集體偶像。如出版《香豔叢書》、主編《香豔雜誌》的王均卿就是王次回的鐵粉，他花重金購得《疑雲集》

<sup>38</sup> 參耿傳友：〈王彥泓詩論——兼及文學史研究的觀念問題〉，收於薪火學刊編輯部編：《薪火學刊》第2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91-119。

<sup>39</sup> 參鄭清茂：〈王次回研究〉，收於王彥泓著，鄭清茂校：《王次回詩集》（臺北：聯經，1984年），頁5-81。

<sup>40</sup> 鄒祇謨、王士禛編：《倚聲初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集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7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倚聲初集》始刻於順治十七年，參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1。

<sup>41</sup> 嚴繩孫：〈疑雨集序一〉，收於王次回：《疑雨集》，頁1。

<sup>42</sup> 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冊1（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頁113。

並加以刊行，其實是一部膺書，卻與《疑雨集》一樣產生影響。

徐枕亞的《玉梨魂》在民初風靡一時，描寫一個寡婦與青年男子的戀愛悲劇，敘事文本由文言、詩詞與駢體文構成，夾帶《疑雨集》的詩句，被視為「豔情」小說。夏志清（1921-2013）在〈論徐枕亞《玉梨魂》〉一文中指出：「這個悲劇充分運用了中國悠久而輝煌的『感傷—豔情傳統』（sentimental-erotic tradition），即從李商隱、杜牧、李後主（李煜，937-978）的詩詞，直至《西廂記》、《牡丹亭》、《長生殿》、《紅樓夢》等戲劇或小說。」<sup>43</sup> 這論斷與王士禛等人對王次回評論如出一轍，可見現代小說對「香豔」抒情傳統的傳承。



圖一：鄭曼陀：〈女子讀天演論〉

這裡涉及「抒情傳統」的現代轉型，如鄭曼陀（1888-1961）的一幅月份牌圖畫（圖一），一個時裝女郎坐在桌邊，托腮凝視，桌上攤著一本《天演論》。<sup>44</sup> 這或許引起饒有興味的問題：她在想什麼？

<sup>43</sup> C. T. Hsia, "Hsü Chen-ya's Yüli hun: An Essay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Criticism," in *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 From th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s*, ed. Ts'un-yan Liu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1), 200-203.

<sup>44</sup> 王姬蕾：〈海上光影年華——月份牌藝術在中西文化衝突中的緩衝作用及其地位問題〉，收於 20 世紀中國藝術史文集編委會編：《藝術的歷史與事實》（重慶：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 年），頁 395。作者謂鄭曼陀此圖「時間約在 1910 年」，此推斷可能略早。另參 Ellen Johnston Laing, *Selling*

「天演」觀念對女界產生怎樣的影響？人的感情是否也在「進化」？是怎樣「進化」的？眾所周知，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給中國社會思想帶來了巨量影響，有關「進化」觀念與近代中國的論述汗牛充棟，一般集中在思想上對知識菁英的影響方面，而這幅圖則顯示「進化」觀念涉及都市媒介與大眾接受的層面，必然涉及現代物質生活與大眾「感情結構」的變化。事實上從「情」、「愛」的語義轉變與一夫一妻的制度移植、物質上聲光化電、視覺技術與交通工具的輸入，及生物、生理、心理方面的知識轉型，都會使感情的體驗及其表現方式發生變化。關於「抒情傳統」的現代表現，學者作了不少研究，而探究清末民初感情領域裡的「進化」話語及各種嬗變症候，有助於為思想、文化的歷史書寫展拓新的面向。

從人類進化的角度來重新認識「情」的論述，在報刊雜誌中並不少見，如 1915 年《鶯花雜誌》中無名氏的〈慨辭〉曰：

嗚呼，吾人何不幸而有此心也！有心斯有知（知實由於腦中，人誤以為心，沿用已久，故仍之）。有知斯生分別，又分別斯生悲樂，悲也樂也，是謂之情。木石無知，是以無情。禽獸魚鼈昆蟲之屬，有知矣，有情矣，惟其為知也簡，故其為情也狹。而吾人者，自植物演進而為動物，自動物演進而成原人，又自原人演進而至今世之人類。歷無數量之劫，閱萬千億兆之年，才臻斯境。其知其情之程度，自遠勝於蠢蠢之動物，而超出於渾渾之原人。<sup>45</sup>

---

*Happiness: Calendar Posters and Visual Cultur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116-126。此書謂鄭曼陀最早於 1914 年在上海張園展出四幅仕女畫之後著稱於時。鄭氏作品見刊於各種雜誌，皆在 1914 年或之後。

<sup>45</sup> 無名氏：〈鶯花雜誌慨辭〉，《鶯花雜誌》第 1 期，1914 年或 1915 年，頁 1。據同期胡無悶：〈玉屑清言〉中孫靜庵引言，署「甲寅冬月」，當在 1914 年冬季，故可以推算雜誌約創刊於 1914 年底或 1915 年初。



對於中國人來說，人的思維由「腦」主宰是一種新知識，經過晚清傳教士大力傳播，混合著基督教義、解剖學和電學，至 20 世紀初被廣為接受。這篇〈慨辭〉說：「人誤以為心」，已是接受新知的表示。作者又闡述「知」與「情」起源於「禽獸魚鱉昆蟲之屬」，隨著「原人」到「今世之人」不斷「演進」，顯然受到「進化論」的影響。從「情」的方面說，「傷感一豔情」的抒情傳統在中國源遠流長，理論上「情」一向受到儒家「溫柔敦厚」的倫理原則的規範，宋明以來盛行「性理」之學，如朱熹提倡「存天理，滅人欲」，使「情」遭到壓抑。晚明時期由於李卓吾（1527-1602）、湯顯祖（1550-1616）、馮夢龍（1574-1646）等人的反撥，「情」突破了「理」的藩籬，而《三言》、《二拍》、《牡丹亭》、《紅樓夢》等小說戲曲在繁盛的世俗文化中扮演了愈益重要的角色，確立了「情」的話語體系。《鶯花雜誌》是一本女性雜誌，主編胡無悶「本世家女，生長燕京」，「其所著《奩豔叢話》一書，尤為海內所推重」。<sup>46</sup> 雜誌內容以「香豔」為主，如胡無悶的《香豔詩話》和《香豔詞話》等。多數從舊時典籍勾稽選輯，如〈閨秀詩傳〉、〈閨秀年譜〉、〈歷朝宮詞〉等具有明顯的女性文學傾向。由〈慨詞〉所示，在外來的「腦」和「演進」觀念影響下中國抒情傳統得到了新的表述，且在都市媒介的加持下拓展其新的空間。所謂「今世之人」在感情上是應當更為豐富複雜的，在這樣的語境中女性的「香豔」文學獲得了某種現代意義。

包天笑是都市新媒體的重要推手之一，也是「進化」思想的熱情傳播者，在他主編的《婦女時報》裡不乏〈進化學上之婦人觀〉、<sup>47</sup>〈夫婦間之愛情及其進化〉之類的文章。<sup>48</sup> 上面提到對於人腦與感知結構的新認識是近代知識轉型的重要環節，再來看他為周瘦鵑編撰的《香

<sup>46</sup> 獨笑：〈客串胡無悶女士小傳〉，《餘興》第 13 期，1916 年 1 月，頁 30-31。

<sup>47</sup> 冰心：〈進化學上之婦人觀〉，《婦女時報》第 13 號，1914 年 4 月，頁 1-8。

<sup>48</sup> 頑譯：〈夫婦間之愛情及其進化〉，《婦女時報》第 19 號，1916 年 7 月，頁 14-16。

豔叢話》一書所寫的序文：

烏乎！吾人自僕緣塵球以來，借匪色盲臭塞之徒，無背於識性，則愛憎又寧有異致哉。須知一切形氣思慮中物，不能自有，賴覺知而後有。以官接象，即意成知，真幻亦紛無定論耳。譬諸入眾香之國，萬豔之叢，令人怡悅謹忻，不可方物，果何為而然乎？則曰：有以太者，目不得而見，鼻不得而臭，而能導茲異香奇豔，以入於人之眼簾鼻觀。凡此腦絡所會，受此激蕩，如電報機，引達入腦，而遂生種種感覺，好色惡臭，君子無嫌，豈不然哉。故雖緇褻孩提之子，見夫奇花初胎，色之燦爛，而味之芬馥，無不心焉好之，是將謂大化之所鼓蕩，而進化學者所有事歟。而不觀今之動植物家，恒言兩性相吸之理，以色香為媒介，此其理尤顯而易著，矧為保蟲所長乎。瘦鵑輯香豔叢話竟，屬我一言以弁首，烏乎瘦鵑，將奪以太之功用，而寄諸文字耶。天笑生序於絳香綠豔之樓。<sup>49</sup>

此文也是以進化原理對於人的感知系統作一種解說，使用了許多晚清傳教士和日本留學生所傳播的新名詞。「以太」指一種統轄宇宙萬物生命的本源，譚嗣同（1865-1898）把它結合「腦氣筋」、「電」的理論支架起他的「仁學」論述。<sup>50</sup>又如「進化學者」、「動植物家」也來自報刊雜誌傳播的新知識，十年前《新民叢報》有日本丘淺治郎（1868-1944）的〈進化論大略〉一文，講動植物的進化原理。<sup>51</sup>同一期另有內明的〈心理學綱要〉，謂耳目口鼻的感官皆受大腦神經系統

<sup>49</sup> 周瘦鵑：《香豔叢話·序》，見周瘦鵑編輯：《香豔叢書》（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年）。

<sup>50</sup> 參 Ingo Schäfer, "Natural Philosophy, Physics and Metaphysics in the Discourse of Tan Sitong: The Concepts of Qi and Yitai," 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Michael Lackner, 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v (Leiden: Brill, 2001), 258-269。

<sup>51</sup> 丘淺治郎：〈進化論大略〉，《新民叢報》第46-48合集，1904年2月，頁1-17。

的控制，末梢神經「傳外界之刺激於腦，又傳腦之命令於身體，故末梢神經譬則電信線，自各部向中央，為種種之報告」。<sup>52</sup>這和包天笑所說的：「凡此腦絡所會，受此激蕩，如電報機，引達入腦，而遂生種種感覺」的論述沒什麼不同。其實在 19 世紀後半期合信在《全體新論》中就聲言腦子是身心的主宰，掌控著人體的血脈骨肉，<sup>53</sup>至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的《格物探源》把人腦比作神奇的電氣，<sup>54</sup>所以內明的〈心理學綱要〉中所講無甚新意，只是所使用的概念不同，如「腦氣筋」變換成「神經系統」之類。

然而包天笑把「以太」、「電報機」、「腦絡」、「大化」、「覺知」等語詞不中不西地雜糅在一起，成爲一種獨具風格的詩化表述。至於說周瘦鵑「將奪以太之功用，而寄諸文字耶」，似是故弄玄虛，實際上把《香豔叢話》置於近代知識轉型的背景中，已賦予其一種「進化」的特質。同時包天笑也在形塑一種新時代具有複雜感知結構的讀者主體，而由「以太」所主宰的「香豔」世界對他們自然充滿魅力。

與情感的「進化」認識相關，清末民初對於「腦」的理論接受引起與傳統的「心」的概念之間的取代或調適，牽涉對照相、石印等視覺與印刷技術的接受與挪用，也影響到圖像與文學話語的表述。這是個值得探討的課題，筆者在別處略有論述，此處不贅述。<sup>55</sup>

<sup>52</sup> 內明：〈心理學綱要〉，《新民叢報》第 46-48 合集，1904 年 2 月，頁 1-2。

<sup>53</sup> 參張寧：〈腦爲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40。

<sup>54</sup> 韋廉臣：〈格物探源·論腦〉，《教會新報》（臺北：京華書局，1968 年影印本），頁 2464。

<sup>55</sup> 參陳建華：〈電影與腦：主體意識的視覺建構——以周瘦鵑小說《紅顏知己》爲中心〉，收於黃愛玲主編：《中國電影溯源》（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1 年），頁 251-263；〈從「心」到「腦」——中國思想主體的語言建構〉，《二十一世紀》第 123 期（2011 年 2 月），頁 123-128。

### 三、《香豔叢書》的現代導向

1909年蟲天子等人主編的《香豔叢書》由國學扶輪社出版，<sup>56</sup>從歷史典籍中輯選出335種著作，分20集，涵蓋詩詞、小說、散文筆記等各類文體。<sup>57</sup>把過去一向受正統文學觀念所排斥的邊緣性作品彙集在一起，已是受到一種新的時代觀念的驅動，乃基於一種對於複雜人性與文學價值的新認識。這一結集猶如文學弱勢群體的一次嘉年華狂歡，對於文學正統與正典而言不啻是一種歷史性反擊。

《香豔叢書》不僅對於中國抒情文學史具重要意義，從社會史角度也展示了男女私密生活空間及其心態與感情的歷史。收入的作品

<sup>56</sup> 編者蟲天子，名張廷華，烏程人。見陳乃乾：《室號別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3。董乃斌在〈王文濡簡論〉一文中據王文濡《古今說部叢書序》中「去歲擔任扶輪事，編輯《香豔叢書》」之語，認為蟲天子即王文濡（見《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頁30-36）。《香豔雜誌》第2期刊登小說《官僚風流記》，作者署「萼蓀」。第4期續刊，作者署「蟲天」。《香豔雜誌》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彙編》第2種（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357、777。董文認為《官僚風流記》「原是他（按：即王文濡）的同事張萼蓀所作，但第三回、第八回卻由他代筆，署名『蟲天』」。並謂該雜誌中署名為「蟲天逸史氏」的小說《蝸觸蠻三國爭地記》也是王文濡所作。按：鄭逸梅《王均卿》小傳謂王「寓居滬上，主進步書局、國學扶輪社輯政有年」（鄭逸梅：《南社叢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00-101。1911年王均卿作〈無題〉詩一組，小序有「發起國學扶輪社於海上，搜幽索秘，刊行名人詩文集筆記約百餘種」之語（新舊廢物：〈無題：辛亥歲暮作有序〉，《香豔雜誌》第3期，約1914年12月，頁521-522）。《香豔叢書》由國學扶輪社出版，另見中國圖書館有公司和記印行之《香豔叢書》，書末版權頁曰：「庚戌年十月初版，中華民國三年八月五版」，此書當據國學扶輪社初版翻印，且曰：「校編者：國學扶輪社」，未署「蟲天子」。考此書體量繁富，書前有蟲天子序文，然未必由其一人輯集而成，王文濡所謂：「去歲擔任扶輪事，編輯《香豔叢書》」，雖主社務，當參與「編輯」。儘管如此，在陳乃乾《室號別名索引》中「蟲天子」乃「清烏程張廷華」之別名，當有所據。《香豔雜誌》中王文濡為主編，張萼蓀為編輯之一，兩人照片均見該雜誌第1期。故兩人為合作者，不當相混，雜誌中《官僚風流記》署「萼蓀」或「蟲天」，當為一人，亦為《蝸觸蠻三國爭地記》之作者。

<sup>57</sup> 見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影印本）。

從漢唐以降至當代，以明清時期最多，當代的如王韜（1828-1897）的《淞濱瑣話》、<sup>58</sup> 樊增祥的傳誦一時的〈彩雲曲〉和知識女性徐畹蘭的〈鬢華室詩選〉，<sup>59</sup> 可見廣采博收的特點。不過如招招舟子的〈問蘇小小、鄭孝女、秋瑾、松風和尚何以同葬於西泠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一文的奇特標題所隱涵的，文中敘及「秋俠」、「以不羈之才，罹無端之獄」，「豈知緹騎來催，竟目爲鉤黨，遂令爰書驟定，同殉於市曹」，其實在憑弔秋瑾（1875-1907），也即此文的「命意所在」。<sup>60</sup> 另如失名（原署「失名」）的〈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稿〉等文，<sup>61</sup> 其實並不香豔，卻透露出與反清革命及時代的精神聯繫。

書中除了收錄大量女性傳記，從后妃、才女、妓女、女伶到女盜、妖婦等，相對於正統史傳皆屬另類，如孫綦〈北里志〉、<sup>62</sup> 崔令欽〈教坊記〉等至今已膾炙人口。從〈十國宮詞〉到〈啟禎宮詞〉，<sup>63</sup> 歷代宮詞成爲重要一類，其實這類詩不一定那麼香豔，從中卻可聽到對於被壓抑女性的同情之聲。

對於知名的豔體或香奩體作品，如《玉臺新詠》、李商隱、溫庭筠（約 812-866）、韓偓、王次回等的作品，大約因爲容易見到，此書皆未收。收入的如黃公輯的〈瑤臺片玉乙種〉則更顯露率性癡情的香豔情調。<sup>64</sup> 顯得突出的是女性書寫的作品如許夔臣纂輯的〈香咳集選

<sup>58</sup> 王韜：《淞濱瑣話》，《香豔叢書》第 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 年），頁 259-334；第 7 冊，頁 7-80；299-376；第 8 冊，頁 7-90；299-376；第 9 冊，頁 7-85。

<sup>59</sup> 樊增祥：〈彩雲曲〉、徐畹蘭：〈鬢華室詩選〉，《香豔叢書》第 3 冊，頁 379-382、551-582。

<sup>60</sup> 招招舟子：〈問蘇小小、鄭孝女、秋瑾、松風和尚何以同葬於西泠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香豔叢書》第 3 冊，頁 513-514。

<sup>61</sup> 失名：〈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稿〉，《香豔叢書》第 3 冊，頁 501-502。

<sup>62</sup> 孫綦：〈北里志〉、崔令欽：〈教坊記〉，《香豔叢書》第 3 冊，頁 93-116、117-128。

<sup>63</sup> 〈十國宮詞〉、〈啟禎宮詞〉，《香豔叢書》第 1 冊，頁 409-479、481-484。

<sup>64</sup> 黃公輯：〈瑤臺片玉乙種〉，《香豔叢書》第 2 冊，頁 409-508。

存)、<sup>65</sup>〈閨墨萃珍〉、<sup>66</sup>莊蓮佩的〈盤珠詞〉等數不在少，<sup>67</sup>如陳維崧的《婦人集》主要記載明清之交的婦女事蹟，<sup>68</sup>其中夾雜著女子作品，這些屬《香豔叢書》中最值得珍視的部分。

諸如余懷(1616-1696)〈板橋雜記〉、<sup>69</sup>趙執星〈海鷗小譜〉、<sup>70</sup>夢畹生(黃式權, 1852-1925)〈粉墨叢談〉、<sup>71</sup>糜月樓主〈懷芳記〉、<sup>72</sup>珠泉居士〈雪鴻小記〉、<sup>73</sup>王韜〈海陬冶遊錄〉等為數甚夥，<sup>74</sup>多為文人自道其風流往蹟，記錄了各地各時期妓界伶人的生活情狀與文人心態。阿蒙編的〈斷袖篇〉是有關歷代同性戀的事情，<sup>75</sup>沈德符(1578-1642)的〈敝帚齋餘談〉中有關春宮畫、雙性變性之類的內容，<sup>76</sup>則屬於性史方面的記載。有一些涉及對女性的規訓，如〈今列女傳〉、<sup>77</sup>章學誠(1738-1801)〈婦學〉之類。<sup>78</sup>有些文字帶有遊戲性質，如陸圻的〈新婦譜〉對過門新婦作了種種嚴厲規定，<sup>79</sup>而芙蓉外史的〈閨律〉<sup>80</sup>則反其道而行之，從妻子角度對丈夫作出種種同樣嚴厲的規定。佚名(原署「佚名」)的〈懼內供狀〉自述懼怕老婆的種種情狀，窮形極狀，令人忍俊不禁。<sup>81</sup>

<sup>65</sup> 許夔臣纂輯：《香咳集選存》，《香豔叢書》第4冊，頁493-572；第5冊，頁207-289。

<sup>66</sup> 〈閨墨萃珍〉，《香豔叢書》第6冊，頁97-123。

<sup>67</sup> 莊蓮佩：〈盤珠詞〉，《香豔叢書》第3冊，頁521-550。

<sup>68</sup> 陳維崧：《婦人集》，《香豔叢書》第1冊，頁105-146。

<sup>69</sup> 余懷：〈板橋雜記〉，《香豔叢書》第7冊，頁177-212。

<sup>70</sup> 趙執星：〈海鷗小譜〉，《香豔叢書》第1冊，頁485-498。

<sup>71</sup> 夢畹生：〈粉墨叢談〉，《香豔叢書》第9冊，頁231-290。

<sup>72</sup> 糜月樓主：〈懷芳記〉，《香豔叢書》第9冊，頁407-428。

<sup>73</sup> 珠泉居士：〈雪鴻小記〉，《香豔叢書》第10冊，頁79-94。

<sup>74</sup> 王韜：〈海陬冶遊錄〉，包括附錄等，《香豔叢書》第10冊，頁391-568。

<sup>75</sup> 阿蒙：〈斷袖篇〉，《香豔叢書》第5冊，頁73-116。

<sup>76</sup> 沈德符：〈敝帚齋餘談〉，《香豔叢書》第2冊，頁9-22。

<sup>77</sup> 〈今列女傳〉，《香豔叢書》第1冊，頁529-538。

<sup>78</sup> 章學誠：〈婦學〉，《香豔叢書》第1冊，頁503-514。

<sup>79</sup> 陸圻：〈新婦譜〉，《香豔叢書》第2冊，頁163-184。

<sup>80</sup> 芙蓉外史：〈閨律〉，《香豔叢書》第2冊，頁509-530。

<sup>81</sup> 佚名：〈懼內供狀〉，《香豔叢書》第4冊，頁127-130。

同樣涉及家庭的男女關係，如明末吳人的〈三婦評牡丹亭雜記〉彙集三位女子對《牡丹亭》的批評，<sup>82</sup>極其珍貴。另一類如冒襄（1611-1693）《影梅庵憶語》<sup>83</sup>、孫瘦梅《小螺庵病榻憶語》等，<sup>84</sup>對親愛者的追憶悲悼，更多細膩深切的情感表現。這一類從「悼亡詩」發展而來，多少帶有自傳和閨房文學的成分，有關《紅樓夢》的一些闡釋與評點文字也具相似性質。叢書中不乏對名花的欣賞與品題之作，如〈看花述異記〉、<sup>85</sup>〈牡丹榮辱志〉，<sup>86</sup>乃至菊花、芍藥等各種花譜之類。花被當作美人的象徵或文人的自我投影，也作為修辭手段增強感情表現的美學意趣。文人愛花體現了自然之性及對閒適或享樂生活的追求。

以上僅對一些主要類別作粗略評述而不及具體作品內容。正如蟲天子的駢文序言有「蓋情之所鍾，正在吾輩，而纖不傷雅」，「群雌粥粥，非奪媚於瑤光」等語，說明「香豔」合乎傳統儒家的男女倫理秩序與審美原則，所謂：「須知比興溫柔，宣尼未經刪削」，即使聖人也不反對「香豔」。這些看似門面話，作者也無意否定儒家傳統，但最後表示：「妄言妄聽，編者只借古以鑒今。見智見仁，讀者毋玩華而喪實」。<sup>87</sup>揭示出編書的目的是古為今用，其價值取決於當今讀者的覺悟與評判，對於這一點作者耿耿於懷，提醒讀者不要玩忽於華麗的表面而應當領會其實質。

作為另類抒情文學的首次大規模結集，《香豔叢書》總體上萌生出一種現代價值觀念，與《國粹學報》同樣是整理國故之雛形。今天看來內容上大多體現了男性對纖弱女性的物變化欣賞或閨房空間美學化的傾向，仍是農耕時代男女經濟地位及其倫理秩序的體現。然而

<sup>82</sup> 吳人：〈三婦評牡丹亭雜記〉，《香豔叢書》第1冊，頁217-236。

<sup>83</sup> 冒襄：《影梅庵憶語》，《香豔叢書》第2冊，頁23-52。

<sup>84</sup> 孫瘦梅：《小螺庵病榻憶語》，《香豔叢書》第4冊，頁215-266。

<sup>85</sup> 〈看花述異記〉，《香豔叢書》第2冊，頁155-161。

<sup>86</sup> 〈牡丹榮辱志〉，《香豔叢書》第2冊，頁385-392。

<sup>87</sup> 蟲天子：〈序〉，《香豔叢書》第1冊，頁3-4。

「香豔」所含的情欲要素更易感動人心，也更具顛覆性，含有突破傳統的可能。《香豔叢書》第一篇是程羽文（1644-1722）的〈鴛鴦牒〉，開頭是明末詩人譚友夏（1586-1637）的話：「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板住，不能成對，齷情而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sup>88</sup> 這樣等於在鼓勵私奔的話語出現在開卷伊始，正值民初社會上流行男女自由結婚學說的時候，對於編者「借古以鑒今」的宗旨不啻是個樣本。這個〈鴛鴦牒〉說如果武則天（武曌，624-705）與魏武帝（曹操，155-220）或與金海陵王（完顏亮，1122-1161）成雙作對，才算旗鼓相當的絕配。但好笑的是往往將一女配數男，如「杭妓周韶，淡遠瀟迴，有邁俗之思。宜操茶具，暫配陶學士，郵亭煮雪。而後念觀音般若經，終配蔡君謨鬥茗」，<sup>89</sup> 雖然似在亂點鴛鴦譜，屬遊戲文章，但某種程度反映了對待女性的開放態度。

第一集中陳維崧的《婦人集》記載了大量明清之交的婦女事蹟，讚揚她們超乎尋常的品行與才情。如王次回的女兒王朗「尤長小詞，為古今絕調」，認為某首詞中「抱月懷風」四字遠勝李清照（1084-1155）的「綠肥紅瘦」。<sup>90</sup> 又如這一則：

松陵吳氏（名銀姊）與鄰邑王生，以才藝相昵。後事露，庭鞠，氏板所供狀灑灑數千言，頗露致語，一時爭傳誦焉。（辭多不載，中有云：「昔淡眉卓女，服縞素而奔相如，漢皇弗禁；紅拂張姬，著紫衣而歸李靖，楊相不追。古有是事，今亦宜然」。蓋表放誕於閨房，寄清狂於螻黛矣。）<sup>91</sup>

在法庭上銀姊引用卓文君（前 175- 前 121）和紅拂女之例為自己的自由戀愛辯護，也是個出格女子，而「放誕」、「清狂」的溫婉評語含有

<sup>88</sup> 程羽文：〈鴛鴦牒〉，《香豔叢書》第1冊，頁13-18。

<sup>89</sup> 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頁14。

<sup>90</sup> 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頁113-114。

<sup>91</sup> 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頁135。



些許同情，至於書中眾多女性書寫作品直接傳達她們的心聲，閃爍著民主性光彩。

1914年王均卿創辦《香豔雜誌》富於女性色彩，在《香豔叢書》之後繼續提升婦女地位，並從事形塑一種新國民的婦女典範。關於王均卿的生平情況不很清楚。鄭逸梅（1895-1992）《南社叢談》有其小傳，王是「浙江吳興人。前清明經，擅詞章。寓居滬上，主進步書局、國學扶輪社輯政有年。後又為中華、文明二書局編刊各家詩文集及楹聯尺牘甚多」。<sup>92</sup>1911年王均卿作〈無題〉詩一組，前面小序有「廿年房老，學界廁身，十載書傭，商場溷跡，保存謬附，託素業於陳編（發起國學扶輪社於海上，搜幽索秘，刊行名人詩文集筆記約百餘種）」等語，<sup>93</sup>可推知他在20世紀初在上海以書局編輯工作為生，所謂「保存謬附」，即附屬於黃節、鄧實的「國學保存會」，由此可見他發起的「國學扶輪社」的思想起點。

除王均卿、張萼蓀、高太癡（1863-1920）等數位男編輯之外還有兩位女編輯，一位即上文提到的蔓華室主徐畹蘭，另一位平等閣主俞佳鈿。第一期上刊登了她們的照相，雜誌中分別有兩人的「蔓華室詩話」和「平等閣筆記」專欄。另外「閨雅」專欄也是婦女發表詩文作品的園地，也有為當時京昆伶人與妓女寫的傳記。同時雜誌也具南社色彩，如陳去病、李叔同（1880-1942）、柳亞子、黃人、汪精衛（1883-1944）、王鍾麒（1880-1913）等人皆為雜誌作者，作品被置於「豔叢」欄目中，與「香豔」的標籤差不了多少。其實這並不奇怪，南社人聲稱繼蹤明末幾社、復社的名士風流，豔情浪漫與矢志革命齊頭並進，蘇曼殊（1884-1918）是南社人心目中的人格楷模，他的「吃花酒」豔事為人津津樂道。正如張光厚（1881-1932）〈再與柳亞子書〉：「若夫紅袖

<sup>92</sup> 鄭逸梅：《南社叢談》，頁100-101。

<sup>93</sup> 新舊廢物：〈無題：辛亥歲暮作有序〉，頁521-522。頁碼均據《香豔雜誌》影印本（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關於《香豔雜誌》各期出版日期參照馬勤勤：〈《香豔雜誌》出版時間考述〉，《漢語言文學研究》2013年第3期，頁60-66。

添香，才人韻事，烏雲對鏡，英雄快心，說劍花前，原不相礙。」如盧文薈指出：這代表了南社人的「共識」。<sup>94</sup> 其實把愛情與民族主義抱成一團，是南社的發明，也是現代文學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源頭。

民國成立後「黨爭」不已，共和政體實踐舉步艱難，而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像多數南社人一樣，王均卿對國事表示失望，又覺得無能為力。他自號「新舊廢物」，即所謂：「不新不舊，不隱不仕，不黨不會，不求不伎，不老不少，不生不死，無以名之，廢物而已」。<sup>95</sup> 看似低調中性，卻給「香豔」披上某種政治色彩，反映了大多南社人所處的進退失據的狀態。如〈吳木蘭女士被捕記〉一文敘述了全國女子同盟會會長吳木蘭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而她在獄中大義凜然，表現了無畏不屈的精神。<sup>96</sup> 然而較為複雜的是王均卿的〈代上海妓界致留東諸偉人書〉的戲謔之文。「留東諸偉人」指陳其美（1878-1916）等人，辛亥時上海光復後他出任上海都督，「二次革命」時為討袁軍首領，失敗後逃亡日本。此文借妓女之口說：「猶記辛亥起義，諸君邁風雲之會，妾等締露水之緣；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和酒無虛時，枕席無虛席。吸國民之膏血，供我輩之纏頭，幸福共和，惠我良多。去歲討袁樹幟，戰鬪開於滬上，攻略密議，得聞綺筵，烽火連天，不離妝閣，妾等金錢飽飫，寵倖厚叨。」這等於在揭露陳其美等人的腐敗作風，「吸國民之膏血」即作者所表達的譴責。但另一方面「官僚得意派之至滬者，過從頗亦不鮮。頤指氣使，官腔充足，承奉顏色，殊非易事，……慳吝性成，小小點綴，已形德色，比諸君等中之坦白易與，揮霍自由真不啻小巫之見大巫也」。這一段形容那

<sup>94</sup> 張光厚：〈再與柳亞子書〉轉引自盧文薈：《中國近代文化變革與南社》（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284。此書中對於南社人的英雄美人，文酒詩劍的生態心態有專章論述，見頁237-311。

<sup>95</sup> 〈「本雜誌主任王均卿君」照相題詞〉，《香豔雜誌》第2期，約1914年8月，頁435。

<sup>96</sup> （未署姓名）〈吳木蘭女士被捕記〉，《香豔雜誌》第1期，約1914年6月，頁61-62。

些屬於袁黨的「官僚得意派」皆齷齪虛偽，相比之下那些「坦白易與」的革命黨人是較為可愛的。最後「試看今日之域中，已是誰家之天下？聚九州之鐵，鑄錯已成；鍊五色之石，補天難必」，對於袁氏愈益倡狂而共和無望的局勢表示悲觀。<sup>97</sup>

「鑄錯已成」一語值得玩味。「錯」在哪裡？對此南社諸人深感痛苦而反復思量，王均卿認為根子出在「革命」，人心由是變得暴戾，誠信喪失，也是受了外來影響的結果，他主張回到「國粹」。他在〈新彤史弁言〉說：「自歐化輸入，夫婦平權、婚姻自由之說喧騰於皮傳西學者之口，而其毒乃浸淫於女界。」<sup>98</sup>所謂「新彤史」是通過搜羅遺聞，編纂文獻，為女性書寫新史，也即「保存國學」宗旨的體現。而刊登閨閣名媛傳記意在為女性樹立「懿行」楷模，<sup>99</sup>如薛錦琴（1883-1960）、吳孟班（1883-1902）、華吟梅（1891-1912）等人的傳記所示，對於她們在接受新教育、遊學海外以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方面，王氏皆極力表彰，因此他反對「歐化」其實試圖在新舊道德之間作某種平衡和調適。可說明這一點的是「海外豔聞」欄目所刊登的大多從外刊翻譯過來，如不斷介紹法國巴黎的「淫奢」風尚，對於流行的「裸足」、「時裝」、「高跟鞋」以及女性如何保持美容和身材等，皆津津樂道。關於這些方面筆者在別處有所論述，<sup>100</sup>說明《香豔雜誌》是新舊雜陳，不乏擁抱現代的姿態。

<sup>97</sup> 新舊廢物：〈代妓女致留東諸偉人書〉，《香豔雜誌》第1期，約1914年6月，頁27-28。

<sup>98</sup> 王文濡：〈新彤史弁言〉，《香豔雜誌》第1期，約1914年6月，頁19。

<sup>99</sup> 《香豔雜誌》第1期末頁有「徵文條例」，列出六條「宗旨」：「表揚懿行」、「保存國學」、「網羅異聞」、「搜輯軼事」、「提倡工藝」和「平章風月」。

<sup>100</sup> 參陳建華：〈「共和」主體與私密文學——再論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頁70-74。

#### 四、《香豔小品》：抒情傳統的內延

鄭逸梅在〈民國舊派文藝期刊叢話〉中曰：「香豔小品是廣益書局發行的一種月刊。胡寄塵主編。……同時尚有《香豔集》，相輔而行，不定期刊，出了二期。時期在1913年間。」<sup>101</sup>此著錄略有誤，據《香豔小品》第一期朱目的序文，末尾署「甲寅春三月」，即1914年陰曆三月，故該雜誌當創刊於1914年，上海圖書館館藏有三期。<sup>102</sup>筆者未見《香豔集》期刊，所見的《香豔集》為1913年11月由廣益書局出版的單行本。《香豔小品》第一期載胡寄塵序文曰：「陽湖汪君石庵，嘗編《香豔集》，多取材於余。其書既成，余篋中所藏弄猶多，南海何君仲琴索之去。益以他處所搜羅，及四方友朋所投贈，遂編香豔小品。余得古近人零星文字，多分類理而藏之，不獨香奩，香奩其一也。今是稿已藉何君為之次第刊行，余將謀及其他。」<sup>103</sup>胡寄塵早年「負笈上海育才中學，喜閱徐光啟、利瑪竇諸人譯著書籍，思想新穎，且有攘夷革命之志。辛亥武昌起義，他助柳亞子編《警報》，又和亞子結金蘭契」，<sup>104</sup>兩人同是早期南社社員。

據胡寄塵序文，他年輕時愛好科學，有志革命，也喜好搜集香豔文字。搜集的資料汪石庵取去編了《香豔集》，剩餘的又給何仲琴編成《香豔小品》，此書筆者未見。胡又自編《香豔小品》雜誌，可見一時蔚然成風，多半是受了《香豔叢書》的影響，《香豔小品》第三期有張廷華的〈題詞〉，有「只有愛情磨不去，臣忠子孝此胚胎」、「我愛美人如愛國，端莊流麗舊山河」等句，<sup>105</sup>不無某種來自他所編刊

<sup>101</sup> 見魏紹昌：《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頁373-374。

<sup>102</sup> 此據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全國報刊索引》編輯部：《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1911-1949）》：<http://p8090-lbcnbksy.ust.hk.lib.ezproxy.ust.hk/search/advance>，檢索日期：2019年6月1日。

<sup>103</sup> 胡寄塵：〈香豔小品序一〉，《香豔小品》第1期，1914年，頁1。

<sup>104</sup> 見鄭逸梅：《南社叢談》，頁227-228。

<sup>105</sup> 蟲天：〈香豔小品題詞〉，《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頁1。

的《香豔雜誌》的政治意涵的投影。但《香豔集》、《香豔小品》似乎啟動了民初的「香豔」潮流，胡寄塵扮演了關鍵角色，也自具特色，值得關注的是朱目的〈香豔小品序二〉中一段：

余嘗謂天地之大，惟情不朽。蓋人類以及於草木鳥獸，無往而不情也。情之厚者為名臣孝子，情之極者為才子美人。其所以能千秋而後使人景仰不已者，非文字之靈，曷克臻此？文字中感人深且易者，舍香豔莫屬。昔孔子刪詩，不廢鄭衛，殆是意歟？方今國學陵夷，歐風東漸，後生小子，幾不知文字為何物。且人類交際，相率以偽。情之一字，漸將漫滅。……是編一出，有益於世，實非淺鮮，不僅保存國粹已也。

傳統「情」的話語在民初復活，在這裡聲稱為普世人文價值。「人類」一詞已含世界文明進化的意涵，跟上面〈慨辭〉的表述相似。在作者看來提倡「香豔」具緊迫性，甚至達到救亡圖存的高度。香豔「文字」最能感動人，屬於「國粹」而須「保存」；由於「歐風」盛行，年輕人「不知文字為何物」，如此強調「文字」是國粹派的根本主張，事實上在民初語言改革的爭論如火如荼，其中不乏廢除漢字的主張。所謂「人類交際，相率以偽」則含有對當時政治亂象的思索，並認為「偽」是病源所在，而須以真「情」來補救，這看法在南社當中也相當有代表性。

所謂「傳統的創新」(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指某種被遺忘的文化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被啟動與重建。這是個普遍的文化現象，學者於此頗多論述。<sup>106</sup>從心理學角度這也是歷史記憶重返人生舞臺而上演新的活劇。在全球時代民族文化傳統的再生更具語言與觀念的跨文化旅行特徵，如「香豔」文學在民初走紅，意味著抒情傳統的現代

<sup>106</sup> See E. J. Hobsbawm and T. O.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此論文集收入多篇論文探討各種傳統的創新現象，書名「傳統的創新」這一詞在人文學界廣為傳播。

重構，為「人類」的普世價值所啟動，乃拜賜於當時流行的「進化」觀念。當然「香豔」鼻祖王次回也受到民初作家的追捧，有趣的是幾乎同時日本的頹廢作家永井荷風把王次回稱作中國的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sup>107</sup> 在傳統創新的理論中有一種所謂「披薩效應」（Pizza effect），緣自義大利披薩在美國走紅，而回傳到本土由是改變了披薩原先的低微身分。<sup>108</sup> 但永井荷風的說法並未回饋到中土，遂錯過「披薩效應」。事實上正是《香豔雜誌》首先發現了波特萊爾，在第四期上有〈專愛醜婦人之怪癖詩人〉這一則，波特萊爾被譯成「抱特來露」，說他在巴黎街頭「遇黑奴婦人或侏儒若殘廢，輒尾隨之，必與之通情愫乃已」。<sup>109</sup> 雖然這樣的描畫過於簡單，不過對於波特萊爾「香豔」不失為進入中國的正途。

「香豔」文學的流行時間並不長，而傳統的更新是一個開展過程。如果把《香豔集》、《香豔小品》與《香豔雜誌》比較，那麼呈現這一過程中內延與外拓的不同態勢。同樣具「國粹」的文化保守的底色，但在現代性趨向上顯出緩急張弛的不同步調。《香豔集》與《香豔小品》代表「內延」態勢，大致沿著《香豔叢書》的路向繼續挖掘香豔作品，限定在文學與審美的範圍，有表彰奇節瑰行的后妃、賢婦、妓女的傳記及少量女性作品，但主要表現文人對女體的旖旎想像，在私密空間內部迴旋與延展，類型方面嘗試新的品種、母題與表現手法，對感情與美學作某些細化與深化的探索。《香豔雜誌》可視為「外拓」態勢，一個明顯區別是它不無濟世的問題意識，仍為「革命」記憶所纏繞，尤其是「新彤史」切入男女平權的時代潮流，通過香豔傳統的更新為女性確立新的文明守則，藉此推進新的社會秩序。雜誌所設置的欄目在通常的詩詞小說戲曲之外，如「海外豔叢」輸

<sup>107</sup> 參王彥泓著，鄭清茂校：《王次回詩集》（臺北：聯經，1984年），頁5-10。

<sup>108</sup> “Pizza effect,”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zza\\_effect](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zza_effect). 檢索日期：2019年6月31日。

<sup>109</sup> 烏蟄廬：〈專愛醜婦人之怪癖詩人〉，《香豔雜誌》第4期，約1915年1月，頁703。

入外刊訊息，「女界新聞」、「工藝欄」介紹有助於婦女職業的技藝知識，「遊戲欄」涉及時下演藝界與妓界的女性，因此與社會現實的聯繫較為密切。如下面將要講到，這種外拓特徵在周瘦鵑的《香豔叢話》中表現得更為顯豁。

《香豔集》中約二十篇作品，分量不大，有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和紀昀（1724-1805）的后妃傳記，從沈復（1763-1832）的《浮生六記》中選出〈閨房記樂〉而重刊，似乎視之為拓展家庭私密情感表現的範本。明末葉紹袁（1589-1648）的〈窈聞〉，是一篇悼亡題材的佳作，未被《香豔叢話》收入，30年代由朱劍芒（1890-1972）收入《美化文學名著叢刊》，<sup>110</sup>另有〈新閨中十二曲〉、〈美人六詠〉、〈西廂記酒令〉等，繼續在開拓「香豔」一路。集中收入胡寄塵、潘飛聲（1858-1934）、俞劍華（1895-1979）、談善吾（?-1937）等南社人的作品，然而置於卷首的〈十憶集〉、〈玉孃曲〉、〈彩雲外史〉這三篇顯然是重頭戲，卻是「同光派」詩人樊增祥的名作，<sup>111</sup>編者顯然不拘派別，的確代表了《香豔集》的藝術水準。所謂「十憶」即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睡、憶妝等十種美人情態，大多出自女性口吻。如〈憶飲〉：「蓮子深杯上口甜，小桃雙頰露紅酣；尋常不道相思酷，倚醉含嬌說二三。」<sup>112</sup>〈憶鬢〉：「閑情無那上眉頭，桂葉雙描滿鏡秋；欲得郎憐嬌不語，手拈裙帶學春愁。」<sup>113</sup>這類描繪不外乎塑造一種為男性所欣賞憐愛的客體化形象，雖然不乏精微的心理刻畫和創新意識。文學中突出記憶的心理表現的如明末清初張岱（1597-1680）《陶庵夢憶》、冒襄《影梅庵憶語》等，大約也是一種近代現象，在風流往蹟的記述中帶有虛擬性，別有如夢似幻、盪氣迴腸之致。

《香豔叢書》載有易順鼎的〈賦六憶〉詞，回憶女子「來」、

<sup>110</sup> 朱劍芒編：《美化文學名著叢刊》（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頁1-25。

<sup>111</sup> 樊增祥：〈十憶集〉、〈玉孃曲〉、〈彩雲外史〉，收於汪石庵編：《香豔集》（上海：廣益書局，1913年），頁1-22、1-4、1-6。

<sup>112</sup> 樊增祥：〈憶飲〉，收於汪石庵編：《香豔集》，頁9。

<sup>113</sup> 樊增祥：〈憶鬢〉，收於汪石庵編：《香豔集》，頁11。

「坐」、「食」、「眠」、「立」與「去」的六種神態，<sup>114</sup>可見晚清時期這一體式的流行，而樊增祥聲言他的〈十憶集〉本是「戲和宋人李元膺」之作，一和再和，欲罷不能，多達二百首。<sup>115</sup>樊氏進士出身，官至甘肅布政使、護理兩廣總督，可說是身處宦途要津的當世名公，這麼對「香豔」情有獨鐘，也有一番表白，在〈再和李元膺十憶詩〉中說：「余學詩自香奩入，染香一集流播人間，十九寓言，比於漆吏。良以僻鳩佳句，動觸閑情，不希廡下之豚，自吐胸中之鳳。少工惻豔，老尙童心，往往譎敘麗情，微之、義山，勉焉可至，若疑雨集、香草箋，則自謂過之矣。」<sup>116</sup>時值民國，樊增祥以「遺民」自居，對香豔如此沉溺或許是一種道德頹廢的表徵，不過他說最初自己學詩即步入「香奩」一路，所謂：「不希廡下之豚，自吐胸中之鳳」，意謂不在乎是否列於聖人之門牆，而更願作個適性的詩人，這是他一向的選擇。其實他所提到的有元稹、李商隱、王次回與黃任（1683-1768），對「香豔」譜系早有認識，但其中仍有高下取捨之分，其間仍有美學與道德的微妙張力。

樊增祥又作〈廣李元膺十憶詩〉，更另創憶羞，憶倦，憶嗔，憶喜，憶潔，憶香，憶浴、憶食、憶學、憶繡等十種情態，其中「憶浴」涉及對女性身體的情色想像，如第三首：「寬褪羅衣玉色鮮，蘭湯莫遣濕雙蓮；那能不稱檀奴意，自撫凝脂亦自憐。」第四首：「薄晚郎歸綺戶口，侍兒守戶立玲嬋；瑣窗嚴密無窺處，時聽香羅蘸水聲。」<sup>117</sup>其實這些表現還是很有分寸，比起元稹和李商隱更為顯露與精細，至於他說比王次回有所「過之」，其實他更講究婉約含蓄，在蕩人心目方面是遜於王的。

《香豔小品》的內容比《香豔集》遠較豐富，如陳去病、柳亞

<sup>114</sup> 易順鼎：〈賦六憶〉，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0冊，頁587-594。

<sup>115</sup> 樊增祥：〈十憶集〉，收於汪石庵編：《香豔集》，頁7。

<sup>116</sup> 汪石庵編：《香豔集》（上海：廣益書局，1913年），頁7。

<sup>117</sup> 汪石庵編：《香豔集》，頁17。



子、李叔同、高旭、胡寄塵、姚鵬雛、朱鴛雛（1894-1921）、姚光（1891-1945）、傅蕁、王蘊章（1884-1942）、呂碧城（1883-1943）等南社的詩人才子才女們一一在場，不啻展覽了南社的風流情懷，與他們慷慨激昂表達革命愛國的詩歌作品形成有趣而不無啟示的對照，而從「香豔」角度來理解南社，不僅更為全面，也更為切實。此時的南社正處於新的危機時刻，共和憲政的實踐與夢想隨著宋教仁被刺和「二次革命」的失敗而破滅，反袁政治抗爭又遭到血腥摧殘，悲憤之餘感到無所作為是當時南社人的普遍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避免政治敏感而創辦文藝雜誌，與《香豔小品》同時出現的《遊戲雜誌》、《民權素》、《小說叢報》、《禮拜六》、《女子世界》、《春聲》、《小說大觀》等也皆由南社文人主政，其中《香豔小品》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主要是個較純粹的詩歌平臺，從上列名單可見作者皆社中精萃分子，以詩文名家，是南社「雅集」唱和的主力。因此對於這一部分詩人而言「香豔」不只具象徵意義，也是他們發現、展示與重構自我的舞臺。

「新彤史」欄目中陳去病的〈徐自華傳〉敘述傳主與秋瑾之間的革命友情。<sup>118</sup> 傅蕁的〈周福貞傳〉和〈毛芷香傳〉講述她們因為支持唐才常（1867-1900）的反清革命而獻身的事蹟。<sup>119</sup> 紀念革命對於南社是題中應有，而這些傳記更旨在樹立新女性楷模。傅蕁的兩篇傳記也出現在「新彤史」中，但《香豔小品》是偶一為之，不像《香豔雜誌》那樣明示其文化保守的議程。

上文引了朱目序文中「保存國粹」的說法，而在胡寄塵的〈香豔小品序一〉中所突出的是「美人」：「看世上美人，不如看畫中美人；看畫中美人，不如看書中美人。」<sup>120</sup> 有趣的是《香豔小品》也刊登「畫中美人」，如〈東洋美人〉圖與裸體的〈西方美人〉圖，<sup>121</sup> 還有英

<sup>118</sup> 陳去病：〈徐自華傳〉，《香豔雜誌》第3期，約1914年12月，頁451-452。

<sup>119</sup> 傅蕁：〈周福貞傳〉、〈毛芷香傳〉，《香豔雜誌》第1期，約1914年6月，頁23-24。

<sup>120</sup> 胡寄塵：〈香豔小品序一〉，《香豔小品》第1期，1914年，頁1。

<sup>121</sup> 〈東洋美人〉圖、〈西方美人〉圖，《香豔小品》第2期，1914年，卷首。

國畫家的表現愛情或家庭之樂的繪畫作品，與大眾傳媒各種「美人」的文化商品的潮流匯合，但胡氏堅持文字的優越性，當然合乎「國粹」的「文美」立場。事實上《香豔小品》中的詩作如徐笑雲〈無題集王次回疑雨集句〉、夢鷗〈無題用玉溪韻〉、人菊〈有憶集義山句〉、道非〈追悼亡妻韞玉集定庵句〉等，<sup>122</sup>從李商隱、王次回到龔自珍（1792-1841），或集句或次韻，好似在展示他們的「香豔」譜系。

「香豔」文學中美人無時不在，的確占雜誌中心舞臺的是「美人」。《香豔小品》中有不署姓氏的〈減字木蘭花·美人十詠〉，分別題為「美人髮」、「美人目」、「美人臉」、「美人頸」、「美人乳」、「美人跌」等。此前在《香豔叢書》中有吳江名閨葉小鸞（1616-1632）的〈豔體連珠〉以髮、眉、目、唇、手、足、腰、全身為題，描畫美人情態。<sup>123</sup>如上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描寫的，已在清末流行。在民初像〈美人十詠〉屬一種次類型，有不少仿效之作；這與照相技術帶來的「聚焦」及面部「表情」感知方式有關。這類作品中女體成為男性的物戀與狂想的對象，有時傳達了現代氣息。如第二首〈美人跌〉：「弓彎貼地，曾與郎肩相並未，一握香鉤，鉤起人間萬古愁。而今天足，六寸膚圓憐軟玉，軟玉溫香，恰似青苗逐日長。」<sup>124</sup>前後兩闕分別表示小腳與天足的兩個時代，古典文學裡文人對女性小腳與弓鞋津津樂道，此詞告別小腳而傾情於「天足」，在男性情趣上或許換湯不換藥，而擁抱新時代的態度是更為健康的。以「百美」為題也在民初發展的新類型，淵源於明清以來青樓選美的「百美圖」，如晚清《鏡景簫聲初集》（1887）和《海上青樓圖記》（1892）是明清青樓

<sup>122</sup> 徐笑雲：〈無題集王次回疑雨集句〉，《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頁1；夢鷗：〈無題用玉溪韻〉，《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頁2-3；人菊：〈有憶集義山句〉，《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頁4；道非：〈追悼亡妻韞玉集定庵句〉，《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頁5-6。

<sup>123</sup> 葉小鸞：〈豔體連珠〉，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頁153-158。

<sup>124</sup> 〈減字木蘭花·美人十詠〉，《香豔小品》第2期，1914年，頁3。

「百美圖」傳統的延續。<sup>125</sup> 另一種「百美」不限於青樓而指所有美女，如顏希源的《百美新詠圖傳》初刻於 1787 年（乾隆 52 年），從歷史記載選出百名女子，從漢代李夫人到傳說中的嫦娥、織女一一加以繪圖和品題，反映了男性的倫理價值與審美意趣，至今有《華三川繪新百美圖》等說明這一形式為大眾喜聞樂見，也可見各時代性別觀念的變遷。「百美」類型不見於《香豔叢書》，因此《香豔小品》登刊顏希源的〈百美新詠〉似在挖掘出這一類型，<sup>126</sup> 有追本溯源之意，而湘湖仙史的〈滬上百美新詠〉為上海百名妓女各作一絕句，就是這一類型的後續之作。

早些時包天笑主編的《小說時報》以彩色女郎作封面，文藝雜誌紛紛仿效，還有流行於文化市場的月份牌、百美圖等都致力於「新女性」的形象塑造，現身於公共空間的不再是妓女，而是居家婦女或女學生，如騎馬、游泳、駕駛汽車或飛機等表現成為傳達都市現代化生活方式與美好未來願景的新樣式。《香豔小品》顯然疏離於這種商業化潮流，主要反映了對「香豔」傳統的文學興趣。

上文提到馮、賈「黨爭」在《香豔小品》中得到反映。姚鵬雛、葉楚傖（1887-1946）的〈春郎曲〉對馮春航推崇備至，並刊出馮的化裝照片，<sup>127</sup> 另有藐廬的〈梅郎曲〉是對梅蘭芳（1894-1961）的捧角之作，<sup>128</sup> 但是為何同時也刊登了易實甫的〈賈郎曲〉？事實上 1913 年 6 月屬於時報報系包天笑主編的《小說時報》發行題為《璧雲集》的增刊，內含易實甫〈賈郎曲〉及樊增祥、羅瘿公等唱和之作，為賈璧雲造足輿論。馮黨不甘示弱，在 7 月由柳亞子、胡寄塵主編的《春航集》出版，一時間雙方黨同伐異，不可開交。從時間上看約半年之後卻收入屬於敵黨的易順鼎之作，這場「黨爭」似乎沒有像一般認為的

<sup>125</sup> 參呂文翠：〈民初海上「百美圖」時尚敘事與性別文化的塑形嬗變〉，《清華中文學報》第 14 期（2015 年 12 月），頁 375-436。

<sup>126</sup> 顏希源：〈百美新詠〉，《香豔小品》第 1 期，1914 年，頁 1-16。

<sup>127</sup> 〈馮春航之化裝〉，《香豔小品》第 1 期，1914 年，卷首。

<sup>128</sup> 藐廬：〈梅郎曲〉，《香豔小品》第 1 期，1914 年，頁 1-2。

那麼水火不容。

正當袁世凱（1859-1916）愈益走向專制且南社屢遭挫折之時，柳亞子南社諸人卻如此熱衷於馮、賈「黨爭」，看似政治上消極，卻有自身內在的邏輯。1912年4月《太平洋報》創刊，柳亞子與葉楚傖等人發起組織「文美會」，「以研究文學、美術為目的」，嗣後文美會併入了高燮、高旭等成立的「國學商兌會」，如果照高旭「吾社之宗風大暢而未盡者，非政治之發揚，乃在道德與文美耳」的說法，那麼《太平洋報》上出現大量觀劇捧角的文章，正是「文美」的表現。某種意義上如馮叔鸞（1884-1942）所說：「革命以還，貴賤之階級稍稍化除，海上諸名士乃有引馮、賈諸名伶而與之遊者，且從而詩詞揄揚，相倡以黨。」<sup>129</sup> 這麼說文人與伶人結黨，是共和以來的新現象。當然所捧者不止馮春航，如楊杏佛（1893-1933）〈與柳亞子書〉云：「……鐵厓顛倒於鳳仙、子和，癡也；而足下之傾倒於馮春航，亦癡也。借人顏色，浪費筆墨，固已癡不可言，而僕以傍觀強作解人，則更癡之又癡矣。」<sup>130</sup> 對於柳亞子等人的「顛倒」、「傾倒」頗含感慨，卻不得已以「癡」自況，也道出南社人以「風流」自許的情態。不光在對待馮、賈方面南社諸人的意見不一致，在對待「同光體」方面，除了姚鵬雛，高旭也不同意柳亞子對於陳三立、鄭孝胥的批評，提出「欲為詩世界大人物」，須「不分派別，必溝兩界而通之，庶乎其為集大成也」。<sup>131</sup> 因此在這樣的脈絡中來看《香豔小品》，正體現了南社對於「文美」的追求及其所含的去政治化傾向。

## 五、《香豔叢話》：抒情傳統的外拓

1911年周瘦鵑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改良新劇」〈愛之花〉，名

<sup>129</sup> 馮叔鸞：《嘯虹軒劇談》（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年），頁6。

<sup>130</sup> 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編》，頁286。

<sup>131</sup> 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編》，頁271。

聲鵲起，至1914年在《禮拜六》週刊發表了大量翻譯與創作，尤其是那些描寫青年男女或含自傳性的追求自由愛情而不遂的「哀情」小說，賺足讀者眼淚。而在1914年底出版的《香豔叢話》以詩話形式大大拓展了「香豔」的現代邊界，標誌著抒情傳統的突變。首先周氏通過書前十幾頁三十餘幅圖像精心拼湊時尚香豔元素並刻意自我時尚化（self-fashioning），把自己包裝成一個現代愛情和愛美的化身，為大眾文化創造了一致新的傳媒範式。

如〈瘦鵲二十歲小影〉所示：西裝革履，領口系蝴蝶結，胸前別花，戴金絲眼鏡，神色略憂鬱。其實他因為生了一場怪病，使得頭髮眉毛都已脫落，外出時要戴帽子和墨鏡，而這幅丁悚（1891-1969）的畫像把他打造成一個時髦俊男。另有托爾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司各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的照片，等於請世界文豪來站臺，在世界視域中襯托出他自己的作家身分。

兩張周氏分別穿中式和西式女裝的照片，題為「願天速變作女兒圖」。他悲歎身為男子的種種苦楚，由是「願欲化身作女兒，倏而為浣紗溪畔之西子，倏而為臨邛市上之文君，使大千世界眾生盡墮入銷魂獄裏，一一為吾顛倒，一一為吾死」。給自己戴上「傾國傾城」的面具，正體現了「香豔」的精髓，無怪乎這一副時髦明星的做派。據王鈍根（1888-1951）的〈周瘦鵲小史〉，由於他在《禮拜六》發表大量作品，其「言情小說專家之名大震，少年男女，幾奉之為愛神，女學生懷中，尤多君之小影」。<sup>132</sup>還有〈瘦鵲之家〉圖，由客廳、書房、臥室等四張照片組成，頗似一個中產階級的氣派。周氏出身貧苦，經過他的筆耕打拼成為作家，才不久離開老城廂裡的簡陋居屋而搬進較為體面的住處。

幾張當紅新劇演員陸子美、凌憐影的照片，有一張周瘦鵲與

<sup>132</sup> 鈍根：〈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社會之花》第1期，1924年1月，頁3。

凌憐影合影，題為「是盈盈姊妹花」。凌演旦角，劇評家馬二先生（馮叔鸞）對他推崇備至，在馮黨、賈黨之外另立「凌黨」，聳動一時。<sup>133</sup>1913年12月周瘦鵑的〈愛之花〉被改編成《兒女英雄》，由新民新劇社演出，凌憐影參演，周因此與他相熟。另有多幅中西式男女愛情圖、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之妻等西方美人圖等。這些圖像與當時文學文化時尚打成一片，突顯了「香豔」的女性特徵。

周瘦鵑在1917年加入南社，但為《香豔叢話》作序的包天笑、王鈍根、吳梅（1884-1939）及數十位為此書題詞的如陳蝶仙（1879-1940）、葉楚傖、程善之（1880-1942）等皆為南社中知名者。書中所論詩文作者凡屬南社的，周氏也一一指出。

《香豔叢話》屬傳統詩話，周氏聲稱以體現「新豔體詩」為宗旨，卻不限於詩歌，包括散文和筆記，加上自己的評點，還有大量根據中外愛情及其文學作品寫成的故事。之所以說此書拓展了「香豔」傳統，有幾個新特點：首先是凸顯女性，呼應了自由戀愛的時代要求，多處突破傳統道德束縛；其次具時代氣息，所收錄的以近當代為主；第三是中西合璧，收錄了許多歐美的香豔文學作品或新聞報導；第四是不拘類型，從中外傳媒多方取材，甚至報紙廣告。

像當時「香豔」風尚一樣，此書大量收羅出自女性的抒發愛情的作品，無論是閨秀名媛、普通婦女或妓女，如蘇婉儀與王廉叔結婚一年之後，王為了功名前途在鄰郡讀書，蘇氏寫了〈四時思夫曲〉：「盈盈十六字王昌，便覺私心暗屬郎；依舊拋人閑處住，問君何事早求凰。」意謂結了婚卻讓我獨居，既然這樣何必要早結婚呢？<sup>134</sup>又如這一則：「金陵妓朱斗兒，號素娥，送所歡於江干，題絕句云：『揚子江頭送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幾行。』又托所歡買束腰，其人以書問尺寸，斗兒答之云：『既許紅綾帕，何

<sup>133</sup> 馮叔鸞：〈凌黨宣言書〉，《嘯虹軒劇談》，「海外劇場拾零」部分，頁6。

<sup>134</sup> 周瘦鵑：《香豔叢話》（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年），卷1，頁10。

須問短長？纖腰君抱過，寸尺自思量。」<sup>135</sup>這兩首小詩率真自然，與傳統佳作相比並不遜色。確實「發現」大量被歷史湮沒的女性作品，並讓她們「發聲」，是清末民初「香豔」文學時尚的主流。

《香豔叢話》的「新」意具有廣泛內容，如亞俠的五首詩中其四云：「妾喜西洋畫，相看總是春；入深還出顯，弄色太撩人。」其五：「妾繡迴文錦，郎繙西字書；書中有花體，相較妾難如。」<sup>136</sup>正如周氏收錄了膾炙人口的黃遵憲（1848-1905）的〈今別離〉並為之讚不絕口一樣，<sup>137</sup>透過亞俠的情詩可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以及編選者的現代傾向。某種意義上「香豔」是一種美人崇拜，美人被賦予一種傳播現代性的角色，更多體現在日常生活方面，如這一則：「有正時裝仕女新信箋，箋端俱有題句，絕工麗，聞是包公毅（按：即包天笑）先生手筆。其〈題絨線手工圖〉云：『扣成千萬結，結結是相思。』〈湖絲阿姐圖〉云：『春絲抽不盡，宛宛是儂心。』〈聽電話圖〉云：『飛來天外纏綿意，訴盡人間宛轉心。』〈拍網球圖〉云：『漫擲相思子，輕拋如意球。』又〈題上海新髻式八種〉云：『堆雲托月、綠雲鎖鳳、東來鬢影、綠鬢堆雲、樣翻墮馬、雙鴛戲影、雲鬢倭墮、舞鳳堆鴉。』諸名亦典雅可喜，美人頭上，端合享此佳名。」<sup>138</sup>由此可見《香豔叢話》的取材極其廣泛，更多從各種近代個人著述與報刊雜誌上截取材料，通過「香豔」的私密窗口與時代變革的風雲相扣聯，更體現了當代特徵，或者說建構了一種現代性。

與其同人相比周瘦鵑的文學視域更為開闊，在眾多報刊雜誌上發表的大量創作與翻譯中包括介紹世界電影方面的發展現狀，或諸如世界「名人風流史」之類也無不貫穿著男女平權、自由戀愛等現代觀念。同樣在《香豔叢話》中有許多來自海外的奇談珍聞，如「巴黎有

<sup>135</sup> 周瘦鵑：《香豔叢話》，卷1，頁9。

<sup>136</sup> 周瘦鵑：《香豔叢話》，卷1，頁2。

<sup>137</sup> 黃遵憲：〈今別離〉，收於周瘦鵑：《香豔叢話》，卷2，頁29-31。

<sup>138</sup> 周瘦鵑：《香豔叢話》，卷1，頁13。

某夫人者，所歡最多，一日忽發奇想，印其所最愛者十人肖影於指甲上，以慰相思。歌舞場中，人每見其玉蔥纖纖，均意中人小影。影裏情郎，眉目如畫。聞巴黎女界，近已盛行此風云。<sup>139</sup>對於當時嚮往自由戀愛的女性來說，這樣的浪漫故事無疑具有鼓動作用。尤其出格的如這一則：

蘇格蘭人富於愛情，情波橫溢，時起狂瀾，遂發生種種之奇聞，而尤以情界中人郵書之新法最為奇妙。有因家庭專制，不能遂其燕婉之私者，甚且名花深鎖，一面無由。其情人乃使家畜之鴿，傳遞情書。鴿馴而忘機，書笥往來，又各有特別之符號，故其事秘而不至洩漏。……英國德哀河畔之新堡，市廛至繁盛，有密司雪梨痕者，豔名噪一時，與鄰人子相悅也，以其貧，女父母深惡之，至杜絕兩人之交接，並書信自由之權，亦不得請。鄰人子乃托友人向女處借書一冊，翌日還之。間一日，則又往借焉。往來既頻，女父母不能無疑，細視其所還書，亦無甚疑竇。不知書中固有兩人血淚所成之情書，附其中也。書不以字，以暗記，暗記之讀法，不以橫，以縱，如中國書然，故女父母亦猝不之覺也，後卒以此演成紅拂私奔之結果。<sup>140</sup>

這一則裡有好幾個故事，大約是周氏根據多種資料來源編制的，實在非常奇特，卻多少與「私奔」有關，明確帶有反抗「專制」的意思。在中國當時的語境裡這樣的故事具有現實意義。其實《香豔叢話》中這類故事還有不少，都體現出相當強烈的民主精神。

<sup>139</sup> 周瘦鵑：《香豔叢話》，卷1，頁6。

<sup>140</sup> 周瘦鵑：《香豔叢話》，卷1，頁37-39。



## 六、餘論：「香豔」的另一種「現代性」視角

自甲午之後中國思想、社會與文化急速轉型，如在民初僅三四年間出現三四十種大多由南社文人主政的文藝雜誌，與文學、美術、戲劇與電影匯成前所未有的「新媒體」，標誌著由「革命」到「共和」的轉向，無論從政治體制、文化思潮、文藝範式、及社會與知識力量的運動等視角來觀察現代性展開都具有重要意義。文學抒情傳統在民初走到社會文化生活的前臺，在動員與形塑國民感情共同體而推進「國粹」本位的社會改良議程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由徐枕亞《玉梨魂》開啟的「鴛鴦蝴蝶派」所示，抒情傳統由「國粹」理念所喚醒，而小說成爲其熔鑄改造的主要載體，相形之下「香豔」詩歌則居於次要地位，這一文學中雅俗階位的升降已意味著某種現代變革。

「香豔」顯然與「文以載道」的正統觀念背道而馳，是突破儒家道德教條的結果，這跟反專制的共和潮流是一致的。這裡所尊重的是個人及其自由表達的權利，所肯定的是人性的複雜性；讚賞情愛體驗與私密空間的藝術探索，對於感情領域則意味著解放與創新。在藝術上以是否產生深刻的感動爲衡量標準，而追求刺心透骨的感官則開拓了一種新的審美範疇。換言之，對「香豔」文學的提倡標誌著對中國文學的重新評估，造成「抒情傳統」的自我更新，是一種確立「純文學」的現代嘗試。

抒情傳統的更新固然來自於「國粹」觀念的驅動，然而其發展則受到印刷資本和消費市場等各種外在條件的制約，尤其在全球文化交通的語境中，更爲社會與文化的現代化趨勢所左右。「香豔」類型僅風行數年便淡出，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文學市場適者生存的鐵律，而上述傳統與現代的「內延」與「外拓」的兩種轉換形態也能說明問題。《香豔集》與《香豔小品》重在「香豔」類型自身的母題、修辭和種類的挖掘、借鑒或移植，其創新限於傳統的邊界之內，因此這種「內延」方式在探索私情空間與豐富感官方面朝縱深延伸，然而缺乏自我

更新的活力，與社會較少互動而難以在現代傳媒中獲得生存。相形之下《香豔雜誌》尤其是《香豔叢話》以「外拓」方式在國粹與西化之間取一種能動姿態，由於周瘦鵑從翻譯切入並汲取外來資源，對人性的演繹與男女平權的共和精神相契合，而較少受到香豔的內在典律的牽制，能運用多種形式適應大眾的需求。

抒情傳統的內延與外拓也體現在小說方面，如徐枕亞與周瘦鵑皆以「哀情」小說著稱於時。《玉梨魂》寫寡婦守節，看似與提倡自由戀愛的時代脫節，但濃烈描繪她的情欲覺醒則突破了「豔情」的倫理底線，且在運用書信體、照相寫實及悲劇精神方面相當西化，這也是該小說能贏得廣大青年讀者的原因。但徐枕亞後來的創作卻強化了他的文化保守傾向，如《雙鬢記》描寫兩個丫鬟如何巧施陰謀詭計打翻舊家庭尊卑秩序，最終以全家死亡收場。<sup>141</sup> 這種以丫鬟為主角與家庭敘事空間實即以《紅樓夢》為藍本追求形式創新，屬於傳統「內延」的方式，雖描寫舊家庭的腐朽，卻缺乏人性的深刻性。周瘦鵑的「哀情」小說多為短篇，相當多產，有人認為是受了徐氏的「毒素」。<sup>142</sup> 但在周氏那裡，文言與白話兼用，創作與翻譯互動，主題貼近當代城市生活，各等人物應有盡有；在景物描寫、情節結構敘事人稱等方面借鑒歐美小說的技巧，抒情傳統主要表現為女子容貌與體態的描寫與感情的心理刻畫，而書信、日記也是常用的形式。由於多樣的主題與形式，抒情傳統是被打碎了的，這種「外拓」的結果，抒情傳統化整為零，也有被化解的危險。

如國粹與西化的弔詭關係，拜賜於人類感情的進化觀抒情傳統得以復活，另一方面也映現了香豔文學中與現代價值不合的東西，如男性的窺私欲與物戀癖，及將女性客體化或對柔順女性的美學化等。然而香豔文學遭到另一種現代性的強勢侵入，即來自「五四」新文化的排斥。1919年錢玄同（1887-1939）、周作人（1885-1967）等人在《新

<sup>141</sup> 徐枕亞：《雙鬢記》（上海：小說叢報社，1916年）。

<sup>142</sup> 陳定山：《春申舊聞》（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71年），頁155。

青年》雜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指斥「鴛鴦蝴蝶派」小說毒害青年，如周作人〈論「黑幕」〉一文說：「到了洪憲時代上下都講復古，外國的東西便又不值錢了。大家卷起袖子，來作國粹的小說，於是《玉梨魂》的豔情小說、《技擊餘聞》派的筆記小說大大的流行。」<sup>143</sup>至20年代初茅盾（沈德鴻，1896-1981）、鄭振鐸（1898-1958）等人猛烈攻擊舊派。如鄭氏說：「香豔體的小說雜誌《禮拜六》……居然有復活之狀態。他們一復活，多少的青年男女的思想與行動，就要受他們的斷送了。」<sup>144</sup>這種代表工具理性和歷史進步的革命思潮在後來不斷被強化，在50、60年代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鴛鴦蝴蝶派」被定性為「反五四逆流」而遭到批判。

其實抒情傳統並沒有也不可能消亡，即使在革命文學當中，如茅盾的長篇小說《虹》是「革命加戀愛」類型的代表作，書中刻畫革命戰士梅行素是個「無可疵議的東方美人」，是「溫柔的化身」，而且用「擁鬢含睇」、「幽怨纏綿」、「薄命之感」的修辭來形容，<sup>145</sup>大有「香豔」的流風遺韻。的確如果按照新文化的反傳統邏輯，抒情傳統隨時都會被革命的「宏大敘事」所吞噬，從這一點來看，正是民初南社諸人在從事都市大眾文化時皆遵循「國粹」本位的中西融合的方針，如最初《小說月報》聲稱「綴述舊聞，灌輸新理」與《婦女時報》的「改良惡風俗」、「發揚舊道德」、「灌輸新智識」，<sup>146</sup>對民國時期上海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以周瘦鵑為例，20年代初聲稱《禮拜六》週刊以「新舊兼備」為宗旨，<sup>147</sup>後來相繼創辦《紫蘭花片》、《紫羅蘭》雜誌，以洋花命名而糅合名花美人的傳統美學，遂引領雜誌界時尚潮流。

<sup>143</sup> 仲密：〈論「黑幕」〉，《每週評論》第4號，1919年1月，第2、3版（亦收於《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頁162-65）。

<sup>144</sup> 西諦：〈雜談〉，《文學旬刊》第2號第4版，1921年5月20日。

<sup>145</sup> 參陳建華：《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04-210。

<sup>146</sup> 〈編輯大意〉，《小說月報》第1期，1910年7月，無頁碼；〈編輯室之談話〉，《婦女時報》第18期，1916年6月，頁96。

<sup>147</sup> 〈小說界消息〉，《申報·自由談小說特刊》，1921年2月13日，第14版。

至 1943 年《紫羅蘭》復刊，仍聲稱：「趣味與意義兼顧，語體與文言齊收」，<sup>148</sup>可見仍不放棄「文言」，繼續其「國粹」的文化政治。

民初「香豔」文學時尚似曇花一現，卻意味深長；它猶如一枚切片，從中折射出民初社會意識、文壇風氣、出版傳播、知識人身分的急劇變動，捲入政治與美學、階級與性別等議題，有些方面，如對於「香豔」文本的情感與美學方面在本文中未能作充分分析與展開。就「香豔」、「國粹」與南社之間的關係而言，須強調的是，「香豔」文學所表現的是情感與欲望的私密空間，在民初被召喚到前臺，標誌著對於複雜人性與文學特質的新認識，與「反專制」的「共和」議程相呼應。在南社人的普遍認知中，「國粹」以文字為根基，「香豔」文學則代表了文字的精粹；同時，含情欲表現的「香豔」文學是極其個人的，這對於理解南社的集體人格來說也頗為關鍵。因此「香豔」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南社文人在民初的去革命化與其如一般所認為的「頹唐」或「墮落」，毋寧是出自一種主動的抉擇，是「真性情」的人格表現。

從科舉廢止後知識分子的出處去向這一點來說，南社人或投身於政黨政治與社會運動，或從事法律、教育等知識專業，其中相當一部分轉向都市文化產業，將想像創意寄附於傳媒與印刷資本，同大眾一起建構感情共同體，實即晚清以來文人墨客的身分轉型，在民初共和理念的驅動與經濟機制的保證下，標誌著一種新型社會力量的崛起，為現代文學場域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

<sup>148</sup> 周瘦鵑：〈寫在紫羅蘭前面〉，《紫羅蘭》第 1 期，1943 年 10 月，頁 8。

## 徵引書目

- 〈「本雜誌主任王均卿君」照相題詞〉，《香豔雜誌》第2期，約1914年8月，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影印本。
- 〈十國宮詞〉，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今列女傳〉，《香豔叢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西方美人〉圖，《香豔小品》第2期，1914年。
- 〈吳木蘭女士被捕記〉，《香豔雜誌》第1期，約1914年6月，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影印本。
- 〈牡丹榮辱志〉，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東洋美人〉圖，《香豔小品》第2期，1914年。
- 〈看花述異記〉，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啟禎宮詞〉，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頁481-484。
- 〈馮春航之化妝〉，《香豔小品》第1期，1914年。
- 〈閨墨萃珍〉，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6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編輯大意〉，《小說月報》，第1期，1910年7月。
- 〈編輯室之談話〉，《婦女時報》，第18期，1916年6月。
- 人 菊：〈有憶集義山句〉，《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
- 內 明：〈心理學綱要〉，《新民叢報》第46-48合集，1904年2月。
-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3833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
- 王文濡：〈新彤史弁言〉，《香豔雜誌》第1期，約1914年6月，北

- 京：線裝書局，2007年。
- 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南京：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
- 王彥泓著，鄭清茂校：《王次回詩集》，臺北：聯經，1984年。
-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教育世界》第76、77、78、80、81號，1904年6-8月。
- 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教育世界》第99號，1905年5月。
- 王婭蕾：〈海上光影年華——月份牌藝術在中西文化衝突中的緩衝作用及其地位問題〉，收於20世紀中國藝術史文集編委會編：《藝術的歷史與事實》，重慶：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年，頁389-397。
- 王 韜：〈海陬冶遊錄〉，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0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王 韜：《淞濱瑣話》，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6-9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丘淺治郎：〈進化論大略〉，《新民叢報》第46-48合集，1904年2月。
- 失 名：〈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稿〉，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失 名：〈懼內供狀〉，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4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仲 密：〈論「黑幕」〉，《每週評論》第4號，1919年1月。
- 冰 心：〈進化學上之婦人觀〉，《婦女時報》第13號，1914年4月。
- 朱淑貞著，冀勤輯校：《朱淑貞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朱劍芒編：《美化文學名著叢刊》，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
-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集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9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西 諦：〈雜談〉，《文學旬刊》第2號，1921年5月20日。
- 余 懷：〈板橋雜記〉，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7冊，上

- 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吳人：〈三婦評牡丹亭雜記〉，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收於章培恒、王繼權等主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呂文翠：〈民初海上「百美圖」時尚敘事與性別文化的塑形嬗變〉，《清華中文學報》第14期，2015年12月，頁375-436。
- 李致中校點：《平山冷燕》，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2年。
- 汪石庵編：《香豔集》，上海：廣益書局，1913年。
- 沈心慧：〈存學保國，自文字之學始——從南社社員馬敘倫、胡樸安、黃侃的文字學成就說起〉，《政大中文學報》第19期，2013年6月，頁121-154。
- 沈德符：〈敝帚齋餘談〉，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周瘦鵑：〈寫在紫羅蘭前面（二）〉，《紫羅蘭》第1期，1943年10月。
- 周瘦鵑編輯：《香豔叢話》，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年。
- 招招舟子：〈問蘇小小、鄭孝女、秋瑾、松風和尚何以同葬於西泠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易順鼎：〈賦六憶〉，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
- 林少陽：〈章炳麟と清末における「南」言説〉，《華南研究》第1號，2014年2月，頁49-70。
- 林香伶：《反思、追索與新脈：南社研究外編》，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
- 芙蓉外史：〈閨律〉，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阿蒙：〈斷袖篇〉，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5冊，上海：

- 上海書店，1991年。
- 侯文燦：〈疑雨集序二〉，收於王次回：《疑雨集》，上海：掃葉山房書局，1926年，頁1。
- 冒 襄：《影梅庵憶語》，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姜 國：《南社小說研究·初探》，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胡寄塵：〈香豔小品序一〉，《香豔小品》第1期，1914年。
- 韋廉臣：〈格物探源·論腦〉，《教會新報》，臺北：京華書局，1968年影印本，頁2464。
- 孫之梅：《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 孫 檠：〈北里志〉，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孫瘦梅：《小螺庵病榻憶語》，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4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徐枕亞：《雙鬢記》，上海：小說叢報社，1916年。
- 徐笑雲：〈無題集王次回疑雨集句〉，《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
- 徐畹蘭：〈鬢華室詩選〉，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烏蟄廬：〈專愛醜婦人之怪癖詩人〉，《香豔雜誌》第4期，約1915年1月，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影印本。
- 珠泉居士：〈雪鴻小記〉，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0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耿傳友：〈王彥泓詩論——兼及文學史研究的觀念問題〉，薪火學刊編輯部編：《薪火學刊》第2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91-119。
- 馬勤勤：〈《香豔雜誌》出版時間考述〉，《漢語言文學研究》2013年第3期，頁60-66。
- 崔令欽：〈教坊記〉，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3冊，上海：



上海書店，1991年。

張寧：〈腦爲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12月，頁1-40。

張春田：《革命與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與中國現代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梁啟超：〈告小說家〉，《中華小說界》第2卷第1期，1915年1月。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第1期，1902年11月。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收於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章培恒：〈《玉臺新詠》爲張麗華所「撰錄」考〉，《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頁5-17。

章學誠：〈婦學〉，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莊蓮佩：〈盤珠詞〉，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國粹學報》第1卷第7期，1905年7月。

許夔臣纂輯：《香咳集選存》，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4-5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陳乃乾：《室號別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陳去病：〈徐自華傳〉，《香豔雜誌》第3期，約1914年12月，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影印本。

陳定山：《春申舊聞》，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71年。

陳建華：〈「共和」主體與私密文學——再論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二十一世紀》第152期，2015年12月，頁65-83。

陳建華：〈「共和」的遺產——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二十一世紀》第151期，2015年10月，頁51-67。

- 陳建華：〈民國初年新媒體與社會文化力量的崛起〉，《文匯學人》第9-15版，2017年2月24日。
- 陳建華：〈從「心」到「腦」——中國思想主體的語言建構〉，《二十一世紀》第123期，2011年2月，頁123-128。
- 陳建華：〈電影與腦：主體意識的視覺建構——以周瘦鵑小說《紅顏知己》為中心〉，收入黃愛玲主編：《中國電影溯源》，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1年，頁251-263。
- 陳建華：《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陳維崧：《婦人集》，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陸 圻：〈新婦譜〉，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傅 尊：〈周福貞傳〉、〈毛芷香傳〉，《香豔雜誌》第1期，約1914年6月，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影印本。
- 無名氏：〈鴛花雜誌慨辭〉，《鴛花雜誌》第1期，1914年或1915年。
- 程羽文：〈鴛鴦牒〉，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頁13-18。
- 鈍 根：〈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社會之花》第1期，1924年1月。
- 馮叔鸞：《嘯虹軒劇談》，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年。
- 黃公輯：〈瑤臺片玉乙種〉，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黃 旦：〈「新報之事，今日之事」：上海進入新媒體時間——初期《申報》與上海研究之一〉，收於黃旦主編：《城市傳播：基於中國城市的歷史與現實》，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23-236。
- 黃 節：〈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第1卷第1期，1905年2月。
- 新舊廢物：〈代妓女致留東諸偉人書〉，《香豔雜誌》第1期，約1914

- 年6月，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影印本。
- 新舊廢物：〈無題：辛亥歲暮作有序〉，《香豔雜誌》第3期，約1914年12月，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影印本。
- 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 葉小鸞：〈豔體連珠〉，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
- 葉倬璋：〈抒情傳統與現代——黃仲則詩在民國〉，《淡江中文學報》第29期，2013年12月，頁408-414。
- 董乃斌：〈王文濡簡論〉，《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頁30-36。
- 道非：〈追悼亡妻韞玉集定庵句〉，《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
- 鄒祇謨、王士禛編：《倚聲初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集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7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頑譯：〈夫婦間之愛情及其進化〉，《婦女時報》第19號，1916年7月。
- 夢畹生：〈粉墨叢談〉，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9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夢鷗：〈無題用玉溪韻〉，《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
- 趙執星：〈海鷗小譜〉，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劉訥嶼：〈梨園內外的戰爭——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上海京劇界的馮、賈「黨爭」〉，《文藝研究》2013年第7期，頁101-110。
- 摩西：〈小說林發刊詞〉，《小說林》第1期，1907年6月，頁1-3。
- 樊增祥：〈彩雲曲〉，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鄧實：〈國學真論〉，《國粹學報》第3卷第2期，1907年2月。
- 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鄭逸梅：《南社叢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獨笑：〈客串胡無悶女士小傳〉，《餘興》第13期，1916年1月。
- 盧文薈：《中國近代文化變革與南社》，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糜月樓主：〈懷芳記〉，收於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第9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藐廬：〈梅郎曲〉，《香豔小品》第1期，1914年。
- 蟲天：〈香豔小品題詞〉，《香豔小品》第3期，1914年。
- 蟲天子等編：《香豔叢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
- 顏希源：〈百美新詠〉，《香豔小品》第1期，1914年。
- 魏紹昌：《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 嚴繩孫：〈疑雨集序一〉，收於王次回：《疑雨集》，上海：掃葉山房書局，1926年。
- 樂梅健：《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 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全國報刊索引》編輯部：《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1911-1949）》：<http://p8090-lbcnbksy.ust.hk.lib.ezproxy.ust.hk/search/advance>，檢索日期：2019年6月1日。
- Dolezelová-Velingerová, Milena and M. Henry Day. "Huang Moxi 黃摩西 (1866-1913): His Discovery of British Aesthetics and His Concept of Chinese Fiction as Aesthetic System." In *A Passion in China: Essays in Honour of Paolo Santagelo for His 60<sup>th</sup> Birthday*, edited by Ling-yeong Chiu with Donatella Guida, 93-141. Leiden: Brill, 2006.
- Hobsbawm, E. J. and T. O.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on, Tze-ki. *Revolution as Restoration: Guocui Xuebao and China's Path to Modernity, 1905-1911*. Leiden: Brill, 2013.
- Hsia, C. T. "Hsü Chen-ya's Yüli hun: An Essay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Criticism." In *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 From th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s*, edited by Ts'un-yan Liu, 199-24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1.

Judge, Joan.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Laing, Ellen Johnston. *Selling Happiness: Calendar Posters and Visual Cultur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Schäfer, Ingo. "Natural Philosophy, Physics and Metaphysics in the Discourse of Tan Sitong: The Concepts of *Qi* and *Yitai*." 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Lackner, 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 258-269. Leiden: Brill, 2001.

Wikipedia. "Pizza effect." Accessed: June 31, 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zza\\_effect](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zza_effect).